

犬牙相制—— 以明清時代的潼關衛為例

于志嘉*

中國自秦代以來，就曾以「犬牙相入」的原則劃定政區邊界，目的在維護高度中央集權制。其後陸續發展，至明代更進一步將「犬牙相制」的概念運用在軍事區劃與行政區劃的邊界劃分上。相鄰的都司、布政司邊界如鋸齒般咬合在一起，另有一些「軍事飛地」地處二都司交界，卻直隸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本文探討的潼關衛，地在河南、陝西交界，自洪武九年設衛，初隸屬於河南都司，永樂六年改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革廢後一度改隸後軍都督府，最後又改為直隸中軍都督府。其所屬一變再變，與其轄區遠離直隸地區，先天具備管理上的困難有關。這一類直隸衛所的配置，本是以君主專制為出發點，以支援中央、箝制地方為目的，然而隨著中央統治力量的衰弱，不但不能發揮應有的功效，反而必須仰賴地方，藉地方之力始能正常運作，可以說極大程度的見證了明代君主專制政權由盛而衰的過程。

「犬牙相制」的現象還體現在衛所軍屯與州縣民地的交錯上。明代潼關衛七十二屯分散在二州七縣，各州縣內部均呈現軍屯與民地犬牙相錯的局面。軍民雜處、軍強民弱的結果，屯軍不當侵蝕地方資源的情形屢有所見。入清以後，潼關廢衛改縣，其初猶為兵餉供應、屯糧徵收之便保持原潼關衛屯的完整性，然終究難抵屯地分散兩省十一州縣所帶來的困擾，逐步縮編成僅掌管潼關、華陰兩境內屯地的潼關廳，明初以來以「犬牙相制」為目的建立的機制一步步邁向土崩瓦解的境地。

關鍵詞：犬牙相制 潼關衛 軍事區劃 衛所軍役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潼關南障秦嶺，北濱黃河，東連涵谷，西拱華山，地居秦豫晉三省交界（圖一），戰略位置重要，是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地。關城始建於東漢建安年間，其後幾經遷徙，至明朝設立潼關衛，城池亦隨之空前擴大。¹ 萬曆《華陰縣志》² 卷一，〈輿地・附潼關衛〉：

衛所宿者兵耳，城墉亦我幅員中地也，我民錯居其中者半，驛遞校官皆屬吾邑，志得附載。攷國初以都督郭儉守之，洪武設千戶所，隸陝西都司。九年改衛，隸河南都司。永樂中又改隸直隸，蓋取犬牙意。練精銳，儲資調，無狃承平，坐建瓴以銷窺關之釁，是有憲使者彈壓其中，非我所敢僭及也。

指出潼關衛城設在華陰縣境，城中居民除潼關衛軍外，約有半數為華陰縣民。自洪武初設千戶所，隸陝西都司；九年改衛，隸河南都司；永樂中又改隸直隸，目的在形成「犬牙相制」之勢，以中央控制地方。

關於「犬牙相制」，周振鶴先生曾以「犬牙相入」形容中國自秦代以來在劃定政區邊界時考慮的一項原則，當時主要應用在距離統治中心太過遙遠的嶺南地區，目的在維護高度中央集權制。但秦代劃分郡界的基本原則是「山川形便」，僅在局部地區輔以犬牙相入的原則，後者亦不過是使郡界與山川的走向不完全吻合而已。到了漢代，嶺南自然區域的完整性更加受到破壞，犬牙相入的原則也從山地擴大到平原地帶，不但用於郡與郡之間，也用於王國與王國之間，目的在使各王國互相牽制，共同維護漢王室的穩固。其後陸續發展，至元代而走入極端。元初行省的區劃是戰時臨時體制的反映，也是它從北向南和自東至西的軍事征服過程的直接產物。由於行省幅員過於遼闊，行省長官又握有軍、民、財政大權，兼之行政區劃層次既多又複雜，為防止分裂割據現象的發生，只有利用犬牙相錯原則一途。這種劃分方法完全破除了山川之險，使各地方缺乏實行割據的地理基礎。但另一方面，地方無險可守，於長治久安不利；行省區域過大，對和平時的行政管理也帶來許多不便。

¹ 參見梁建邦，〈漫話潼關〉，《渭南師專學報（綜合版）》1989.1：103-107。

² 王九疇修，張毓翰纂，萬曆《華陰縣志》（八卷，補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以下簡稱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清康熙五十二年重印明萬曆四十二年刊本攝製）。

明興之後，由於都、布、按三司分立，權力較為分散，因此在南方統治基礎穩固的地區，行省劃分大抵回復到唐宋時期的範圍，大致能照顧到與自然地理區域的對應關係。但在國都所在的南京、西南邊界的貴州，以及河南、廣東等地，開始從另一個方向造成新的犬牙相錯形勢。³ 除此之外，明代還在軍事政區與行政區之間設計了「犬牙相錯」的情形。周振鶴先生的女弟子郭紅即指出：

永樂以後的都司轄區與洪武時的轄區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因為明初在許多地方繼承了元代高級政區的邊界，後根據實際需要對布政司、都司、行都司邊界進行了大規模調整，遂使高級軍事轄區形成了後世的狀況。……這種調整使得各都司、行都司的軍事邊界與布政司的行政邊界在許多地方都不重合，從而與相鄰的都司、布政司如鋸齒般咬合一起，犬牙相錯，使高層政區、軍事區相互制約，更有利於中央集權。……此外都司間還有一些軍事飛地，如潼關衛、寧山衛、九江衛等，位於兩個都司交界處，卻直隸於五軍都督府。邊界與管轄上的犬牙相錯及飛地現象雖然在洪武時已有所顯露，但大多還是在永樂年間形成的，這是成祖奪得皇位之後加強統治的一大措施。

根據郭紅的說法，這種使相鄰的都司、布政司邊界如鋸齒般咬合在一起的作法，到永樂年間有了很大的發展，目的在使各高層政區相互滲透、相互牽制，藉以增強中央對地方的軍事控制。而像潼關、寧山、九江等衛，地處二都司交界，卻直隸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更可說是「犬牙相錯」發展至極致的表現。郭紅特別將這類衛所稱之為「軍事飛地」，認為是「衛所制度發展到永樂中期已趨完善的標誌之一」，但同時也指出，「這種犬牙交錯的軍事統轄關係所帶來的弊病，在全國都有表現」。⁴ 郭紅的論述從都司衛所的建置出發，對於制度之利弊得失僅簡單觸及。筆者曾撰文探討明末直豫晉交界地區的衛所軍戶與軍民詞訟，對於寧山

³ 以上參見周振鶴，〈犬牙相入還是山川形便？——行政區域劃界的原則〉，氏著，《體國經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國行政區劃沿革史》（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90），頁106-136；〈從基本一致到部分背離——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劃的關係〉，同前書，頁192-193。明代各地方行政區劃間「犬牙相入」的情況嚴重，因政區邊界劃分不善引發了許多社會、經濟、文化乃至自然環境的問題，入清以後逐步受到調整，具體個案可參考馮賢亮，〈疆界錯壤：清代“蘇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江蘇社會科學》2005.4：211-217。

⁴ 參見周振鶴主編，郭紅、靳潤成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257-258, 292, 302。

衛的相關問題做過初步研究，⁵ 本文更進一步以潼關衛為中心，集中探討「犬牙相制」政策的實際影響。⁶

二・潼關衛的所屬

潼關衛地位獨特之處，早在明代即已受到時人矚目。丘濬在《大學衍義補》卷八七，〈治國平天下之要・備規制・城池之守〉，講述據險設守之道：

古者列國，其山川丘陵各有險阻之處，往往據之以為守。……我國家分天下為兩畿十三藩，於凡交界之處，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城界華、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願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京師，聖祖之意深矣。⁷

就特別以潼關衛為例，指出在兩省交界之處設衛城守，乃是明代設置衛所的一般原則，而潼關衛更特殊之處，在於其衛城界於河南、陝西之間，距京師甚遠，卻直隸於京師而不屬於河南都司或陝西都司。邱濬生於永樂十八年（1420），卒於弘

⁵ 參見于志嘉，〈從《薈辭》看明末直豫晉交界地區的衛所軍戶與軍民詞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4 (2004)：745-795。

⁶ 由於明初衛所資料普遍缺乏，本文尚無法掌握到「犬牙相制」政策究竟曾發揮過何等效用，只能期待將來能有更多資料出現，再做補充。

⁷ 本文三位審查人之一認為丘濬所謂之「聖祖」應指太祖，由之推斷潼關衛改隸京師的時間應在洪武朝；由於當時的京師在南京，正吻合下文所引乾隆《同州府志》「改隸南京中軍都督府」之說。但乾隆《同州府志》將潼關衛改隸南京中軍都督府的時間繫在永樂六年而非洪武朝，筆者至今亦未見任何史料將之繫於洪武朝。而潼關衛的所屬先後經過幾次變化，丘濬只注意到聖祖「不以屬河、陝二都司」，卻不提潼關衛在改為直隸衛所之前，曾先後隸屬於陝西都司及河南都司，這些都是在洪武朝發生的事。丘濬跳過了這個過程，只從結果論聖祖之意，在沒有證據證明他確實瞭解整個變化過程的情況下，似不宜在「聖祖」一詞上多做文章。又，有關潼關衛在洪武朝之所屬，當洪武九年改潼關所為衛時，乃是隸屬於大都督府下的河南都司。洪武十三年正月罷大都督府改設五軍都督府，河南都司並所轄衛分遂隸屬於中軍都督府；參見傅鳳翔輯，楊一凡、田禾點校，《皇明詔令》（收入劉海年、楊一凡總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3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卷二，頁47-49，〈罷中書省及都府詔〉。該詔令列舉直隸於五軍都督府之各衛所名稱，潼關衛不在其中。而成書於洪武二十六年的《諸司職掌》，仍將潼關衛列為河南都司屬衛；參見明太祖敕輯，楊一凡點校，《諸司職掌》（收入楊一凡、田濤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3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頁256，〈兵刑工都通大職掌〉。此後一直到永樂六年改隸北京行都督府以前，都是河南都司屬衛。

治八年 (1495)，⁸ 他所謂的「京師」指的是北京，然而，乾隆《同州府志》卷二〇，〈職官志·附潼關縣〉：

洪武七年設守禦千戶所，隸陝西都司。九年設衛，隸河南都司。永樂六年改隸南京中軍都督府。

卻指出潼關自洪武七年 (1374) 設所，九年升為衛，到永樂六年改隸直隸，是隸屬於南京的中軍都督府。⁹ 而《明史》¹⁰ 卷四二，〈地理三·陝西〉：

洪武七年置潼關守禦千戶所。九年十一月升為衛，屬河南都司。永樂六年直隸中軍都督府。

則是將潼關衛列為直隸中軍都督府衛所。另一方面，萬曆《大明會典·兵部·城隍一·都司衛所》卷一二四，又將潼關衛列在直隸後軍都督府下，¹¹ 更為潼關衛的所屬帶出第三種說法。這三種說法究竟何者為是，有必要加以釐清，本節因討論潼關衛之所屬。

潼關自洪武元年以郭儉守之，七年置守禦千戶所。當時陝西都司尚未設立，潼關所其實是隸屬於陝西都司前身的西安都衛。洪武八年九月改西安都衛為陝西都司，¹² 遂改隸陝西都司。九年升為衛，改隸河南都司。及永樂六年再改所

⁸ 參見邱濬著，林冠群、周濟夫校點，《大學衍義補》（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前言·邱濬和他的《大學衍義補》〉，頁1。

⁹ 參見吳泰來，乾隆《同州府志》（六〇卷，首一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二〇，頁20a-b，〈職官志·附潼關縣〉。同樣的說法又見於劉於義等奉敕修，沈青崖撰，雍正《陝西通志》（一百卷，首一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1-55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雍正十三年刊本影印，1983〕），卷三，頁17a，〈建置二〉；卷二二，頁36a，〈職官三〉。但雍正《陝西通志》因係雜抄各書而成，間有將潼關衛列為「直隸中軍都督府」衛所者；如卷五，頁97a，〈建置四〉；卷三五，頁43b，〈兵防二〉。

¹⁰ 張廷玉等奉敕修，《明史》（三三二卷，目錄四卷，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5）。

¹¹ 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萬曆《大明會典》（二二八卷，臺北：新文豐出版社據明萬曆間司禮監刊本影印，1976），卷一二四，頁29b。郭紅據此，一度以為永樂六年其實是改潼關衛為「直隸後軍都督府」；參見氏著，《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頁65；但在後出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一書中，又推翻前說，認為「明朝中後期，中軍都督府在外衛所在轄區上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永樂六年、七年潼關衛、蒲州所、睢陽衛、歸德衛、武平衛、汝寧衛的歸屬」；參見頁541。對於史書中何以出現如此歧異的不同說法，惜未能多作考慮。

¹² 參見黃彰健校勘，《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國立北平圖書

屬，《明史》謂其「直隸中軍都督府」，乾隆《同州府志》卻謂「改隸南京中軍都督府」，二者之間似有出入，實則並無不同。這是因為永樂元年正月改北平為北京，原本設在應天府的京師成為南京，原來的五軍都督府亦不妨稱為南京五軍都督府。但當時北京並未另設五軍都督府，因此所謂的「南京中軍都督府」，其實就是「中軍都督府」。而潼關衛本為河南都司屬衛，河南都司歸中軍都督府管轄；及永樂六年潼關衛改換所屬，史書不論是謂其「直隸中軍都督府」或「改隸南京中軍都督府」，都指的是潼關衛由中軍都督府下的河南都司屬衛，改為直隸於中軍都督府的在外衛。唯潼關衛在改為直隸中軍都督府在外衛之前，其實經歷過一番波折，《明史》或乾隆《同州府志》略而不提，以致都偏離了事實。以下即嘗試說明其間的變化。

潼關衛在永樂六年確實經歷過一次改動，其說見《明太宗實錄》卷八〇，永樂六年六月甲申：

改潼關衛隸北京行後軍都督府。

「北京行後軍都督府」的全名為「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時或簡稱「北京行都督府」。這個機構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乃是配合永樂元年北京的建立，在正式定都北京之前設置的一個臨時性地方軍事機構。明初中央最高軍事機構為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將各都司、行都司分隸於五軍都督府之下。永樂元年正月改北平為北京，二月即廢北平都司，改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當時為凸顯北京作為「承運興王之地」，地位特別崇隆之故，曾大舉擴充北京行都督府的規模，除原有的北平都司屬衛外，另外又從山西行都司及北平行都司調入許多衛所改隸其下。因此自設置伊始，北京行都督府屬衛的數量就遠遠超越一般都司、行都司，甚至與南京相較亦不遑多讓。

北平都司原屬後軍都督府。新設的「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意指「後軍都督府」在北京的行署，與後軍都督府地位相埒，彼此不相隸屬，俱歸成祖直轄。永樂七年，朱棣為要部署北部邊防戰守事宜，並視察北京營建狀況，首次巡幸北京。是年，設行在五軍都督府於北京，北京行都督府遂就近接受行在後軍都督府的管轄。同一時間，朱棣為要展現其遷都北京之決心，有意進一步擴大北京行都督府的規模，除規劃增設若干衛所外，又從鄰近的山東、山西、河南都司屬

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6；本文引用《明實錄》均依據此版本），卷一〇一，頁4a，洪武八年九月癸丑。

衛中選取了若干衛所改隸北京行都督府。而潼關衛就是在這一波調動中改為北京行都督府屬衛的。

永樂十八年九月，定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改北京為京師，不稱「行在」；在應天者加「南京」字。十一月，遂下令革北京行都督府。原北京行都督府屬衛改為直隸後軍都督府。潼關衛既為北京行都督府屬衛，此時就該屬後軍都督府管轄；唯不久又因為仁宗決意復都南京，於洪熙元年（1425）復設北京行都督府，仍以「行在」稱北京諸司。至宣德三年（1428）八月再廢北京行都督府，屬下各衛除部分已改為親軍衛或改屬山西行都司，其餘都改為直隸於行在後府的在京、在外衛。宣德五年六月成立萬全都司，又將部分衛所改隸萬全都司，仍隸屬於行在後軍都督府。正統六年（1441），北京宮殿成，遂廢「行在」而將原直隸於行在後府各衛改為直隸於後軍都督府下。¹³

正統六年以後的潼關衛應該是直隸於後軍都督府的在外衛。¹⁴ 但上引《明史·地理三》及乾隆《同州府志》都以為潼關衛是直隸中軍都督府的在外衛，除所載改屬中府的時間明顯是錯誤的，事實上有更多明代史料都採用這個說法。例如正德《大明會典·職方清吏司·城隍一》卷一〇八，¹⁵ 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的《陝西通志·土地·建置沿革》卷七，同年刊行的《全陝政要》卷一，¹⁶ 以

¹³ 以上參見于志嘉，〈明北京行都督府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4（2008）：683-747。與之同時設立的有「北京行部」；參見徐泓，〈明北京行部考〉，《漢學研究》2.2（1984）：569-598。

¹⁴ 筆者初欲從實錄的文字來推斷潼關衛改屬的時間，但如《明英宗實錄》卷二八，頁5a，正統二年三月癸卯；卷四二，頁1a，正統三年五月乙酉；卷四八，頁6b，正統三年十一月癸卯等條，實錄都只以「直隸潼關衛」稱之，並不說明是直隸於中府或後府。但同書卷一一四，頁11b，正統九年三月甲戌有云：「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掌潼關衛事姚深奏乞暫於本衛支俸。從之」。大寧都司屬後軍都督府管轄，姚深既以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掌潼關衛事，推斷當時的潼關衛亦應為直隸後軍都督府之衛。

¹⁵ 李東陽等纂，山根幸夫解題，正德《大明會典》（一八〇卷，首一卷，東京：汲古書院據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刊本影印，1989），卷一〇八，頁29b，〈職方清吏司·城隍一〉；又見卷一七九，頁2b，〈五軍都督府·中軍都督府〉。

¹⁶ 參見趙廷瑞纂修，嘉靖《陝西通志》（四〇卷，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1-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影印，2005〕），卷七，頁42b，〈土地·建置沿革〉；卷三九，頁9b，〈政事·兵防〉；龔輝，〈全陝政要〉（四卷，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2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嘉靖刻本影印，1988〕），卷一，頁53b。

及《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陝西省·西安府》卷六，¹⁷ 都將潼關衛列爲直隸中府衛，唯各書皆未提及潼關衛曾隸屬於北京行都督府復改爲直隸後府衛之事。而《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竟然同時將潼關衛列在中軍都督府及後軍都督府的直隸在外衛所名單中，¹⁸ 更令人匪夷所思。¹⁹ 查《明孝宗實錄》卷一六二，弘治十三年（1500）五月丙子：

¹⁷ 參見《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十六卷，收入《明代史籍彙刊》第13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嘉靖二十年焦璉刊本影印，1970〕），卷六，頁5a，〈陝西省·西安府〉。是書不著撰人，四庫存目著錄有五卷本，據提要，乃新喻縣丞陶承慶校正。陶承慶據符執桓纂修，康熙《新喻縣志》（十四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889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影印，1989〕），卷五，頁9a，〈官師志·職制〉，任新喻縣丞在萬曆間。劉兆祐謂該書「為今傳載明代官制最詳備之書」，惜成書時間已不可考；見《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敘錄》，頁2。

¹⁸ 參見《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3, 2219。又見註20。

¹⁹ 按：李默、黃養蒙等刪定，《吏部職掌》（不分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1996〕），卷二，頁30b，〈文選清吏司·缺科·迴避地方〉有云：「直隸潼關衛坐落陝西華陰縣，北直隸轄，開在南直隸冊內，三處人不選」。其文意頗難解。由於有關明代文官迴避制度問題非筆者能力所能探討，本文無法深論，筆者最為關心的，是潼關衛歸「北直隸轄」（意指直隸後軍都督府。相對於此，南直隸衛所指的是直隸中軍都督府衛所）的下限究竟在哪裡。根據潘星輝的考證，《吏部職掌》編修刪定的時間應始於嘉靖二十九年，刊刻時間則在嘉靖三十年七月至十月間；見〈現存明代《吏部職掌》版本考〉，氏著，《明代文官銓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272-275。至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所收之萬曆刻本《吏部職掌》，則是就萬曆二年張瀚主持纂修者續添增考而成，因此書中雖有萬曆二年以後事例。是書書後附有「四庫提要」，謂「是編於明嘉隆以前吏部制度沿革載之最悉」；但據《吏部職掌·序》頁1a-b：「部有職掌，大端見於會典，而簡弗能詳。李冢宰時言（默）始定吏部職掌。梓行已久，而後多變更。張仁和（瀚）時，復同四司諸當事括綜累朝，斟酌近事，重加修明。讀其書，詳者不冗，簡者不遺，精而核，典而權，游夏復起，不能損益一字，此真國朝第一文章，更無可並者也。萬曆以來，享國長久，間有一二因時易制，變窮為通，較之往冊，稍有同異，似不可不載。故舉其見行諸例出於近年者，為附增考。至若例有從前停止，疑於可省，而前哲悉存，不肯輕去，良以祖宗始制自有深意，因革損益，所當備考」，可知是書雖以精核典權、不冗不遺著稱，但對於累朝舊制，由於自李默初定時即採用「咸存弗削」的態度，以致書中新舊制並存，後人除非嚴加考證，否則不易釐清制度先後之變化。在別無其他相關資料輔證的情況下，本文因此無法藉之判斷潼關衛屬於北直隸的下限。姑援引於此，藉以說明潼關衛所屬問題的複雜性。又，有關明代文官迴避制度，可參考顏廣文，〈明代官吏任用迴避制度〉，關文發、顏廣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209-229。

秦府汧陽王誠淵、永壽王秉欃各奏，欲遣人往杭州府收買羅段。得旨：許往一次，後不為例。仍行中軍都督府出給勘合，行潼關衛知之。

發往潼關衛的勘合既由中軍都督府出給，²⁰ 顯示至遲到了弘治年間，潼關衛已被改為直隸中府在外衛了。改隸中府的確切時間及原因，目前雖然尚無法考出，但潼關衛的所屬一改再改，除與其地理位置特別重要有關外，不容否認，與「犬牙相制」的體制亦脫不了干係。

如上所述，潼關衛自守禦所時代隸屬於陝西都司（西安都衛），到改設潼關衛後初屬河南都司，繼而改隸北京行都督府，後又成為直隸後軍都督府的在外衛，其間經歷數度轉折。就潼關衛的地理位置而言，潼關位居黃河自北南流轉東之河曲西南，地在陝西，自宜由陝西都司管轄；但在由所改衛之同時，卻劃歸鄰近之河南都司轄下，顯示朱元璋這時對於軍事政區的規劃，已有「犬牙相制」的計算，擬藉此方式使行政區劃與軍事區劃互相牽制，而潼關衛就是一著重要的棋子。及永樂六年再次改換潼關衛的所屬，將之納入北京行都督府屬衛，就時機而

²⁰ 據正德《大明會典·五軍都督府·中軍都督府》卷一七九，頁2b：「凡本府行所屬都司勘合，遵照題奉欽依，編置字號，類填發行，年終類繳」。其下開列該府所屬都司、衛所之勘合字號，例如：「中都留守司中字號、河南都司龍字號、沂州衛相字號、歸德衛華字號、新安衛前字號、潼關衛樓字號」等等，乃是將潼關衛列於中軍都督府下。同樣的文字又見於萬曆《大明會典》卷二二七，頁5a-b，〈五軍都督府·中軍都督府〉。唯同書卷一二四，頁29b，〈兵部·城隍一·都司衛所〉，又將潼關衛置於直隸後軍都督府下，是《明史》之外另一個前後不一致的例子。按：明代勘合種類繁多，《明太宗實錄》卷二三一，頁1b，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丁卯有云：「上謂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曰：明年改行在所為京師，凡軍衛合行事宜，其令各官議擬以聞。於是行在左軍都督薛祿、掌北京行後軍事廣平侯袁容等言：今革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其簿書宜付後軍都督府承掌，印送禮部銷。夜巡銅牌、門禁鎖鑰付中軍都督府掌。出關勘合令中軍都督府編置，兵部公用印，送印綬監收。別置文簿付各關為驗。凡出關者，通政司具奏，赴印綬監填給勘合照驗」。可知所謂的「出關勘合」，在永樂十八年底初次廢革北京行都督府時，是由中軍都督府編置，印綬監收管，需用時再由印綬監填發的。而《明宣宗實錄》卷四六，頁4a，宣德三年八月甲申所云：「遼東安樂州知州侯進奏：臣奉命赴任，携家以行，經山海關，已給行後軍都督府出關勘合，守關指揮葛昇等稽留不遣，必索取賄賂始得放行，凡經過者皆苦其貪暴，請罪之」。則顯示在洪熙元年復設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後，出關勘合復歸行後軍都督府出給。宣德三年八月甲申，侯進持行後軍都督府發給之出關勘合擬出山海關往遼東赴任，不料遭守關指揮稽留。數日後，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再度被革，見同卷，頁5b，同月辛卯；可惜沒有資料顯示此後之出關勘合是否仍改由中軍都督府統一編置。但無論如何，正文所引史料說的是「往杭州府收買羅段」，只是通關，並非出關，二者情況並不相同，不能混為一談。

言，固然是配合行在五府的設立，擬進一步擴大北京行都督府的規模；目的實在強化中央對地方的統治。唯潼關衛治所與北京行都督府乃至其後的後軍都督府所在之北京城相距甚遠，這也使得潼關衛在內部管理問題上不可避免的面臨了許多複雜的矛盾。

例如《明憲宗實錄》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甲午：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余子俊等奏：榆林守備官軍舊於陝西西安四護衛、延綏・慶陽三衛、河南南陽衛・潁上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調之，而陝西屬衛所調官軍有貧弱及逃亡者，從鎮守總兵巡撫官驗實，按季造冊，令都按二司會選精壯者補之，副參將等官不得擅出批帖，煩擾衛所，已有著令。第河南衛所不及該載，又潼關衛設於陝西、河南界上，寧山衛設於山西、河南界上，俱直隸督府，都按二司不相統屬，雖有巡按御史，以境土隔遠，難於偏歷，遇有勾補，未免延緩後期。夫守邊重事，必從宜處之，庶可有濟。乞敕所司詳議，今後陝西、河南衛所官軍，從鎮守、巡撫等官，令都按二司選補；潼關衛令陝西按察司選補，寧山衛令山西按察司選補，俱查究諸衛所戶口文冊，以憑勾稽革弊，不得以弱卒單丁虛輾名數。有徇情誤事者，聽延綏巡撫官究問，或奏請處治，庶法令昭明而戰守有備。事下兵部尚書白圭等議，從其奏。上是之。

榆林鎮的邊操軍來自陝西、河南二都司以及直隸潼關、寧山二衛。²¹ 寧山衛設於洪武十一年七月，衛治在山西澤州。初隸河南都司，永樂七年正月改隸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²² 正統以後與潼關衛一同改為直隸後軍都督府在外衛，其後未再改變所屬。潼關、寧山二衛同樣參與榆林邊操之役，也同樣受到統屬不便的困擾。歷年以來，遇有官軍貧弱及逃亡者，陝西都司屬衛由鎮守榆林總兵及巡撫官驗實，陝西都、按二司負責勾補；河南衛所及潼關、寧山二衛則或因制度未明，或因「直隸督府，都按二司不相統屬」，常勾補愆期。成化七年，以延綏巡撫余

²¹ 川越泰博將潼關衛與寧山衛分別列於陝西、山西地區，乃是依照行政地理單位所做的區分，不符合明代軍事組織管理實況；見〈明代班軍番戍考〉(1)，《軍事史學》16.4 (1981)：80-81。同樣的問題亦見於其有關京操班軍的研究：〈明代班軍番戍考〉，《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史學科》22 (1977)：133-162。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有詳細討論；見頁152-189，可參考。

²²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九，頁2b，洪武十一年七月癸未；《明太宗實錄》卷八七，頁4a，永樂七年正月戊辰。

子俊之議，定此後河南衛所官軍需勾補者，由鎮守、巡撫等官令河南都、按二司選補；潼關、寧山二衛則就近分令陝西、山西按察司選補。這樣的結果雖與回歸陝西都司管轄尚有一段距離，²³ 卻也明顯背離了「犬牙相制」的初衷，只能說是迫於現實，不得不爾的權宜之計。

根據余子俊的說詞，榆林邊操係「守邊重事」，必須「從宜處之，庶可有濟」；而兵部官員顯然也認同了這個說法，才會同意讓陝西及山西按察司代行潼關、寧山二衛邊操班軍選補事宜。然而，潼關衛除了邊操還有京操重務，同樣也面臨「境土隔遠」、直隸巡按御史「難於偏歷」的困擾，相關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呢？

按：崇禎十五年（1642）四月二十四日〈兵部為暫免河南班軍十五年秋班事題行稿〉²⁴ 記京操班軍：

察得本省額有京操秋班軍士，出自宣武、河南、信陽、潁川、潁上、潼關六衛所，每年起發赴京工操。

乃是將潼關衛列入河南省額下，²⁵ 乍看之下，容易讓人誤以為潼關衛此時是否又改隸河南都司屬下，其實不然。從《明神宗實錄》卷七一，萬曆六年（1578）正月甲戌：

兵部覆鳳陽撫按官吳桂芳等題稱：潁州兵備原管陝西潼關衛，而督發往返，道遠不便。自萬曆六年秋班為始，改屬本兵備道，就司督發河南都司統領赴班。從之。

²³ 彭勇根據實錄此條的記載，認為「潼關衛改由陝西都司管理是在成化七年」。但由實錄引文可知，成化七年僅是將有關勾補事宜交由陝西按察司管理，陝西都司不得干預，與河南官軍歸河南「都、按二司選補」不同，因此不能說是「改由陝西都司管理」。同書討論潼關衛的隸屬變化，直引康熙《潼關衛志》「永樂六年改隸中軍都督府」的說法，未做進一步之討論，以致其後考察各都司參與京操事務的衛所數量時，因以《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所列都司衛所作為比對標準，而誤將潼關衛並列於南直隸（直隸中軍都督府）與北直隸（直隸後軍都督府）下，行文之中也時而誤將潼關衛稱為「南直隸後軍都督府」衛；參見《明代班軍制度研究》，頁158, 168-169, 180, 183, 188。

²⁴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41：2990。41：2990意指該《總匯》第41冊，編號第2990號檔案。以下同。

²⁵ 同樣將潼關衛列入河南額下的，又見《總匯》28：2117，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兵部為城工浩繁嚴催各省班軍赴工事行稿〉。其中開列崇禎十年分應補秋班軍人數目，將潼關衛列於「河南司」下。

以及同卷，萬曆六年正月丙子：

潼關隸在陝西西安府境內，而軍伍、屯營、考選軍政俱在彼中，與直隸撫按原不相干。唯以零衛，班軍因附中都留守司統領，以故責赴江北掛號。不但道遠人難，亦且不便管轄。且該衛接壤河南，須赴河南領班都司下統領，發營收操，庶為妥當。

可知潼關衛在萬曆六年以前，其京操班軍原歸潁州兵備道管領，由之督發中都留守司（治所在鳳陽府）統領赴班，這是因為原本直隸中軍都督府衛所參與京操者俱歸中都留守司代管；²⁶ 但因潼關衛班軍為遷就中都留守司統領，必須遠赴江北掛號，「不但道遠人難，亦且不便管轄」，乃於萬曆六年改歸潼關兵備道督發河南都司統領發營收操。當時的潼關衛舉凡「軍伍、屯營、考選軍政」諸事務俱已聽由陝西撫按代行，但因京操事務陝西都司屬衛全未參與，潼關衛是陝西地區衛所唯一參與京操的衛所，²⁷ 相關業務不得不依附在其他都司的統領下。潼關地近河南，河南都司屬衛參與京操者甚多，²⁸ 潼關衛因而就近改歸河南都司代管。只是以中都留守司代管潼關衛京操之所以績效不彰，問題不全出在「道遠人難」；潼關衛以直隸中府衛所，京操班軍附中都留守司統領，其「軍伍、屯營、考選軍政」卻由陝西撫按代行，才是問題真正所在。這種多頭馬車的設計，對於軍士管理而言，其實是非常不利的。而萬曆六年儘管將潼關衛京操改歸河南都司代管，其餘事務仍在陝西撫按監督下，過去因管理不同調滋生的問題依然存在。因此沒

²⁶ 據袁文新、柯仲炯等纂修，天啟《鳳書》（八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69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天啟元年刊本影印，1985〕），卷五，頁24a-25a，〈武備篇第六·其征調京操〉：「本（中都）留守司附領直隸」衛所，自泗州衛、宿州衛、武平衛、歸德衛、潼關衛以下，總計十七衛九所，其中除蒲州所未被《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3列入中府屬衛外，其餘俱為直隸中府衛所。然據茅元儀輯，《武備志》（二四〇卷，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卷一九七，頁15b，〈占度載·山西〉，可知蒲州所實隸屬於直隸潼關衛。《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9雖將之列為直隸後府衛所，實則應與潼關衛同時由直隸後府改為直隸中府衛所。又，彭勇指出，明代南、北二直隸衛所的部分軍務是交由中都留守司和大寧都司代為管理的；參見《明代班軍制度研究》，頁155, 178, 183。

²⁷ 根據彭勇的研究，「陝西都司的衛所參與京操時間較短，數量不大，資料不多」；「英宗即位後，廢除了陝西都司的京操班軍」；「嘉靖年間，陝西都司與行都司再次選派軍兵入衛薊鎮，保衛京師，則屬另一種輪番入戍的性質——薊鎮入衛兵」；參見《明代班軍制度研究》，頁189, 73。正統以後應無任何衛所參與京操，因此稱潼關衛為「零衛」。

²⁸ 參見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頁166-170。

過多久，河南巡撫亦得過問潼關衛的軍伍食糧，²⁹ 但負責管理潼關衛班軍事務的潼關兵備道仍由陝西按察司副使出任，³⁰ 形成隔省官員接力負責的狀況。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實錄指出萬曆六年時的潼關衛，「軍伍、屯營、考選軍政」俱在陝西，「與直隸撫按原不相干」；但由《潼關碑石·孫中川墓志銘》³¹ 所記，孫塤（別號中川）於嘉靖二十年襲潼關衛指揮使後：

直隸撫按考選軍政□□僉書，兼管屯局。丙午（嘉靖二十五年），蒙案委署衛印。……庚戌（二十九年）考選軍政掌印，當道上司如陝西巡按柯公、謝公、傅公，延綏□□張公、巡按曹公、盛公、徐公、盛公、劉公，直隸巡按蘇公、巡按傅公、項公，山西河東巡按□公、劉公，皆有文移獎勵，共計一十四次。直隸巡撫商公、巡按盛公具疏荐舉，二□皆□堪任參巡守備之選□兵附將材簿，將以大用之也。

不難窺知至少在嘉靖中期，有關潼關衛官的軍政考選事宜，還是由直隸撫按主導的；唯參與提供意見的，還包括了陝西巡按、延綏撫按及山西河東巡按等。

萬曆以後的潼關衛因其邊操或京操任務之不同，時而被稱作陝西潼關衛，³² 時而又被稱作河南潼關衛。例如，涂宗濬〈及時議修內政治實政事疏〉（萬曆三十五年），³³ 在述及邊操事務時：

四曰：清班價以裕修守。臣惟設險守國，修防為先。延慶邊長一千二百餘

²⁹ 參見《明神宗實錄》卷一二四，頁1b，萬曆十年五月戊午：「河南巡撫褚鈇覆查過河南一省并直隸潼關等二十六衛所額官一千二百六十二員、額軍四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名，歲用本折俸糧五十五萬八千八百二十石有奇、冬衣布三千一十一疋、花一千八百五十八斤有奇、馬二百二十一匹、料草銀四百三兩，額徵屯糧三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石有奇（以下略）」。

³⁰ 參見《明神宗實錄》卷二四九，頁2a，萬曆二十年六月辛卯：「河南按察司副使詹思謙調陝西副使整飭潼關兵備道」；又見卷二六五，頁2a-b，萬曆二十一年十月癸巳；卷二七三，頁5a，萬曆二十二年五月癸巳。

³¹ 參見吳鋼主編，劉蘭芳、張江濤編著，《潼關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頁106-107，〈孫中川墓志銘〉。

³² 陝西潼關衛的稱法嘉靖間已經出現，例如《明世宗實錄》卷一六九，頁1a-2b，嘉靖十三年十一月甲子：「兵部覆奏右侍郎徐問陳武備八事。……一、練外兵以為羽翼，言山東德州、武定、山西寧山、陝西潼關等衛俱為直隸而設，承平既久，徒存虛名，宜行清查」。即明知其為直隸衛，仍以所在地區標示，藉以凸顯其實質意義不再。

³³ 參見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五〇四卷，補遺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四四七，頁10b-13a，〈涂司馬撫延疏草〉。涂宗濬上此疏在萬曆三十五年，事見《明神宗實錄》卷四三一，頁6b，萬曆三十五年三月辛巳。

里，合四路之兵，不過五萬有餘。先年調集陝西西安四衛官軍四千三百員名、潼關衛官軍三千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蒲州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五十五員名、河南南陽衛官軍二千七百八十二員名、潁上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二十三員名、直隸寧山衛官軍一千四員名，每年輪班赴鎮，與各營堡官軍相兼戰守（以下略）。

即按照潼關衛之地理位置，將之列於陝西西安四衛之後；同時將隸屬於潼關衛之下的直隸蒲州所稱作山西蒲州所。但對寧山衛卻又清楚開作「直隸寧山衛」，顯示其標示標準已趨混亂。另一方面，以京操事務為對象的〈兵部為班軍到京點收事題行稿（尾缺）〉（崇禎十三年七月）：³⁴

但班政屢經臣差疏陳，屢奉嚴旨申飭，迺於點收之際，驗察各衛所。如山東則沂州、諸城，河南則河南、潼關，道路稍近，事體或宜，正身頗多。則是將沂州衛與潼關衛分別列於山東與河南都司名下。沂州衛與潼關衛同為直隸中府衛所，據《明神宗實錄》卷七一，萬曆六年正月丁卯：

兵部覆鳳陽撫按吳桂芳等奏：青、徐、沂、泗聲勢相聯，向年設衛所，其沂、莒等處雖隸山東，實屬直隸統轄，蓋欲唇齒相援，共為犄角，俱有深意。但官軍班操赴直，則仰賴專在行糧，苟沂、莒等州縣不與給發，沂、青二道不與催徵，欲使各軍枵腹上班，安望其不脫逃留滯也。今該撫按議改山東就近管轄，俱應照議，其未完應追軍人工價，姑寬限本年八月內完報。從之。

可知在潼關衛京操改歸河南都司代管之同時，沂州衛京操亦改歸山東都司就近管轄。沂州衛、莒州所俱為治所在山東境內之直隸中府衛所，二衛所與中都留守司所在的鳳陽府距離不算太遠，卻仍因班軍脫逃問題嚴重，不得不改歸山東都司代管，其中關鍵就在班軍赴操所需之行糧必須仰賴附近州縣給發，直隸衛所卻因管轄機構在中央而不在地方，每逢出操前夕，地方兵備道不與催徵，附近州縣不與給發，班軍缺乏行糧輿援，只有脫逃一途。³⁵ 奏疏中吳桂芳以「唇齒相援」形容

³⁴ 參見《總匯》37：2701。

³⁵ 張鹵，《皇明嘉隆疏抄》（二二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72-7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1996〕），卷九，頁59a-b，〈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凌儒謹題為數陳愚見以裨聖治事〉（嘉靖四十二年）有云：「蓋中都留守司所轄，凡操軍共四萬四千有奇，通計行糧銀一十四萬餘兩，各在該府關給，百計留難。如該班應給銀一千，止先給與三百，即三百之內，又該加一扣除。領操官得此，止帶一二管事人役遠巡赴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東支西吾。萬一稽查，即便棄營而

直隸衛所與地方的關係，用意在模糊「犬牙相制」帶來的衝突矛盾，可惜地方官面對此種安排並不領情，反而因事不關己，對相關衛所一應事務俱皆採取相應不理的態度。以致於原本被設計來支援中央、箝制地方的直隸衛所，竟落到處處需要仰賴地方支援，非附庸於地方無法正常運作的地步。究其癥結，固然與明末衛所軍事功能低落，缺乏與地方抗衡的力量不無關係；但因制度本身設計不良，上轄機構與衛所在地相去太遠造成管理上的漏洞，導致衛所本身不能發揮應有功效，卻是自創立伊始即存在的問題。而在問題深刻化以後，又礙於祖宗成法，仍以直隸之名各歸鄰近都司、按察司就近代管相關業務，實則已無任何實質意義可言。

潼關衛轄有前、後、左、右、中及中左、中右並蒲州守禦千戶所。入清以後，潼關衛一度歸西安府管轄。³⁶ 順治十二年（1655）裁左、前、後三所，十四年裁衛經歷、知事。³⁷ 雍正二年（1724），配合全國大規模裁撤衛所，改併州縣，原守備、千總、及教職等缺一併裁撤，同時移華陰縣縣丞駐潼關，³⁸ 潼關衛就此走入歷史。³⁹

走矣」。中都留守司轄下衛所尚因所在地之各府州縣刁難，領不足額，直隸衛所處境之艱難更不難想像。

³⁶ 據舒其紳等修，嚴長明纂，乾隆《西安府志》（八〇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31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影印，1970〕），卷一，頁3a，〈地理志〉，西安府於「明萬曆初，領州六、縣三十一。本朝因之，又增領潼關衛一。雍正二年，衛廢」。顧誠指出：由於大部分的衛所都管轄有一塊地盤，轄區內的子粒徵收無論在數量或方法上皆與州縣徵收的賦稅不同，彼此的力役制度也有很大差別，因此「清朝在接管各地時，對於明代已經逐漸失去軍事職能的衛所採取了暫時維持現狀的辦法」。其後陸續裁併，部分衛所被改為州縣；內地衛所因轄地較少，一般是裁撤衛所後，把屯田併入附近州縣。「另一種衛所“行政化”的過渡措施是把原屬都司管轄的衛改隸於府，衛的名稱雖然不變，但已納入行政系統，與州縣沒有多大區別」；見〈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2：15-17。清前期潼關衛的情形即屬後者。

³⁷ 參見《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或參網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ji?@7^1923298734^22^^1@@563270807>（搜尋，2008.06.02）〕；本文引用《清實錄》均依據此版本），卷九〇，頁707-2，順治十二年三月丙申；卷一一一，頁872-1，順治十四年九月丁未。

³⁸ 參見《清世宗實錄》卷二六，頁403-2，雍正二年十一月。

³⁹ 入清以後，兵制以八旗、綠營為主，明代殘留的衛所逐步被裁併，其順序大抵從無屯丁衛所開始，漸及於無漕運衛所。雍正二年以後，唯「邊衛無州縣可歸，與漕運之衛所，

三・潼關衛的軍役

潼關衛由直隸後府改直隸中府，由於該衛自有專城，又是直隸衛所，管轄權在中央，以致方志中有關其軍役的記載較少。⁴⁰ 不過，自成化七年議准由陝西按察司負責選補邊操缺額班軍以後，按察司官得以查究潼關衛戶口文冊，連帶使「軍伍、屯營、考選軍政」諸事務也逐漸轉由陝西撫按代行，因此在嘉靖《陝西通志》中，可以看到潼關衛的戶口、屯地以及衛官人數。總計戶七千八百四十、口一萬六千七百；屯地二千七百二十九頃零、屯糧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石零、地畝銀二百四十八兩五分；指揮十一員、千百戶一百一十員、鎮撫五員、經歷・知事・教授・訓導・驛丞・大使各一員。《全陝政要》另載該衛軍馬：官原額一百六十八員，實在一百二十四員；軍原額八千三百一十八名，實在二千四百十一名。俱開在西安府下。⁴¹

另一方面，自潼關衛京操軍改歸河南都司代管，河南巡撫亦得過問潼關衛的軍伍食糧後，河南地方官的施政手冊中也出現了有關潼關衛的相關記事。例如《兩河觀風便覽・兵防》卷四有〈軍餘〉、〈軍器〉、〈屯營〉、〈班軍〉等項，其中〈班軍〉項下開列「河南都司所屬衛所并直隸所」參與京、邊操之春、秋兩班軍數，就有「潼關衛：秋班京操軍四十三名，每名月支本色糧八斗，本□

軍民各有徭役」者，仍保留衛所的形式；衛所軍戶以軍籍應衛所屯田漕運之役，雖屬兵部管轄卻不參與軍務。部分衛所並一直延續到光緒二十八年才被廢止。參見崑岡等奉敕著，《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一二二〇卷，北京：中華書局據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1991），卷五五六，頁12b，〈兵部・官制・衛所〉；植木野宣，〈衛所制度の行方〉，氏著，《清代重要職官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5），頁365-378；顧誠，〈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郭松義，〈歸併舊明衛所實行“以屯濟運”〉，王毓銓、劉重日、郭松義、林永匡，《中國屯墾史》（北京：農業出版社，1991），下冊，頁277-307；于志嘉，〈清代江西衛所的沿革與人口分佈〉，《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295-327。

⁴⁰ 本文前言引萬曆《華陰縣志》卷一，頁5b-6a，〈輿地・附潼關衛〉，指出潼關衛地在華陰，「志得附載」，然通書僅就潼關衛建置及軍屯有簡單的記載，其餘皆不及。但也並非所有的直隸衛所均如此，例如註54提及之直隸中府歸德衛，嘉靖《歸德志》卷二，頁8a-b，〈建置志・署制〉，即詳列該衛官旗軍人數及軍役內容；見王崇、李應奎修，黃鈞等纂，嘉靖《歸德志》（八卷，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60冊〔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嘉靖刊本影印，1990〕）。潼關衛的特殊狀況可能與該衛自有專城，外界難窺其奧有關。

⁴¹ 參見嘉靖《陝西通志・民物・戶口》卷三三，頁12b；卷三四，頁11a，〈民物・田賦〉；卷三七，頁7a，〈政事・職官〉。又見《全陝政要》卷一，頁54a-b。

□□倉支」的記載，清楚呈顯出不同業務分由兩省官員代管的狀態。⁴²

然而，也正因為雙方都無法掌握到潼關衛的全面狀況，各地方志就筆者管見所及，皆未有明確述及潼關衛軍役者。僅乾隆《同州府志·職官志·附潼關縣》卷一九在記載衛官員額之後，提到潼關衛除設掌印官一員之外，另有「佐貳四：管屯、管操、巡捕」，⁴³略可窺知潼關衛軍役以屯田、京操、邊操、巡捕為大宗。以下即就此四項分別加以討論。

先看屯田。嘉靖《陝西通志》卷三九，〈政事·兵防〉有云：

潼關衛：隸中軍都督府，而官軍則陝西例得調用。內駐劄兵備副使，兼分巡同、華，轄河南閿鄉、靈寶、山西蒲州地方，屯堡一百一十二。

潼關設兵備道始於正德七年（1512），當時是因為山西賊李午作亂猖獗，應陝西巡撫藍章之請而設的。⁴⁴十年賊平，一旦革廢，至嘉靖十六年才又復設。⁴⁵轄區範

⁴² 《兩河觀風便覽》（不著撰人，殘存三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間刊本攝製）的記載方式相當嚴謹。例如軍器，據《明英宗實錄》卷六，頁6a-b，宣德十年六月己巳：「行在工部奏：鎮守陝西少監張福、都督同知鄭銘等言：西安左前後三衛、潼關衛軍器俱缺，……盜二萬、甲二萬五千、刀鎗牌銃等件俱以萬千計，宜令陝西都司、布政司支官物造給，以備邊警。從之」。可知潼關衛軍器是由陝西都司、布政司負責支給官物督造的。《兩河觀風便覽·兵防·軍器》即不錄潼關衛。但由是書卷四，頁32b：「代管南直隸汝寧千戶所每年額該軍器四十副」，可知同樣是直隸中府的汝寧所，其軍器是歸河南都司、布政司代管的，方法是軍三料銀由該所自辦，民七料銀由河南省出辦。《兩河觀風便覽》成書於萬曆中期，《四庫提要》稱其「大抵鈔撮案牘為之，而於河南掌故一一具詳。較地志諸書羅列山川，侈陳人物，濫載藝文者較為近實。特其大者多見於史，而小者亦備載於通志，不免為己陳之故牘耳」。但也正因為其中記錄了地方行政的具體資料，更能真實呈現地方行政的細微部分。大澤顯浩即將之定位為布政司衙門等官僚的實務手冊，代表的是一種經世的地理學；參見〈『兩河觀風便覽』について〉，《汲古》23（1993）：100-106。

⁴³ 參見乾隆《同州府志·職官志·附潼關縣》卷一九，頁20a-b。其中開列衛官人數，與嘉靖《陝西通志》不同，計有指揮使四員、指揮同知五員、指揮僉事八員、衛鎮撫四員、千戶三十六員、所鎮撫三員、百戶五十五員。或許是後出的數字。又見楊端本纂修，康熙《潼關縣志》（收入《新修方志叢刊》第47〔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康熙廿四年刊民國廿年鉛字重印本影印，1967〕），卷中，頁1a，〈職官〉。

⁴⁴ 康熙《潼關縣志·職官·名宦》卷中，頁2a，記張禴「正德七年任」，「開設兵道自公始」；卷中，頁3a，〈職官·兵憲〉又謂：「及明世宗朝，寇李午作亂猖獗，遂敕憲副張公猷提兵勦寇，因令備兵潼關。關之設兵憲也，自張公猷始」。查《明武宗實錄》卷八三，頁6b，正德七年正月己巳，可知張禴乃是在正德七年因巡撫都御史藍章請添設兵備副使于潼關勦賊，而由泗州知州陞為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潼關等處兵備的。同年十二月破賊，參見同書卷九五，頁7a，正德七年十二月丁卯。康熙《潼關縣志·職官·兵憲》所載有誤。

圍原本東止陝州、嵩、廬、永寧、澠池、弘農，西至同、華，南至商州，北至解、蒲；⁴⁶ 嘉靖十八年，又將邠涇兵備道迤東白水等六縣割屬潼關兵備。⁴⁷ 萬曆三年，更定陝西潼關、關內二道轄屬，將同、華二州，朝邑、白水、郃陽、澄城、韓城、華陰、蒲城七縣俱令屬潼關兵備道專轄；渭南一縣與耀、乾等州，咸、長等縣則屬關內兵備道專轄。⁴⁸ 而潼關衛京操軍此時仍歸潁州兵備道管轄，至萬曆六年始改歸潼關兵備道。此後，潼關兵備副使專管潼關衛班軍，分管河南閿鄉、靈寶二縣，陝西同州九州縣，山西蒲州并守禦千戶所。⁴⁹ 其所管轄陝西、河南、山西各地屯堡一百一十二處，其中位在山西蒲州地方的屯堡屬蒲州所屯軍所有，潼關衛屯田主要分佈在陝西西安府和河南陝州境內。

潼關衛屯、守軍比例不詳，開始屯田大約是在永樂二十二年。⁵⁰ 康熙《潼關縣志》卷上，〈田賦〉曰：

關歷代設兵，有民自明始。蓋以流移遷徙來者，安插於豫秦各州縣地方。每夫授田百畝，令其開荒納糧。彼時開創不無隱占浮額，後命羅侍郎清查。旨下：百畝曰額地，禁民私鬻；踰百畝則首報於官起科，名曰首報，聽民鬻之；其未報者令續報於衛。窮民希圖鬻利，多有以額內地作首報賣者，於是首報數溢，而額地多缺。至今子孫受空地賠糧之累。

⁴⁵ 參見《明武宗實錄》卷一二六，頁1b，正德十年六月己未；《明世宗實錄》卷二〇〇，頁1a，嘉靖十六年五月庚辰。

⁴⁶ 參見《明武宗實錄》卷一六二，頁3b，正德十三年五月甲寅。當時潼關兵備一度被廢，分守潼關太監黃玉奏乞如兵備例，並得管理原兵備轄區內各州縣。兵部議不可，詔特許之。

⁴⁷ 參見《明世宗實錄》卷二二六，頁2a，嘉靖十八年七月丙子。

⁴⁸ 參見《明神宗實錄》卷三七，頁8b-9a，萬曆三年四月壬戌。

⁴⁹ 參見萬曆《大明會典·兵部·鎮戍·督撫兵備》卷一二八，頁9a。

⁵⁰ 參見向淮修，王森文纂，嘉慶《續潼關縣志》（三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247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間重排印清嘉慶二十二年刊本影印，1970〕），卷上，頁19a，〈田賦〉：「明永樂二十二年，傳諭守領諸兵，除去戎衣，各務農業，遂有軍田之設」。《潼關碑石·前言》，頁2謂：「潼關人口中，孫、李、劉、郭、姚、鄭、孟、顧、王等姓，即是歷朝駐守潼關將領之後裔。特別是明朝洪武年間，實行軍屯制，大量的駐守官軍留在潼關」。然其後所舉，皆為洪、永間因功授為潼關衛官之事例，並無證據顯示洪武間已開始屯田。《潼關碑石·前言》，頁2續言：「特別是明代永樂年間，守兵解甲務農，繁衍相延」。考之方志，當以後說為是。又，嘉慶間潼關縣已改為潼關廳，嘉慶刊的志書原名《續潼關廳志》，當係民國間重排印時改為今名。

可知衛軍屯田一分爲百畝。⁵¹ 由於開創時不無隱占浮額，嘉靖間命羅侍郎清查，⁵² 仍以百畝爲額地，禁止衛軍買賣；踰百畝之地則需經過首報起科的程序，其田聽任衛軍買賣。

屯糧分夏、秋兩班輸納。康熙《潼關縣志》卷上，〈田賦〉云：

明初念關地磽薄遙遠，不堪全征；額地百畝，分夏、秋二班納輸。夏班每百畝夏征麥二石一斗六升零、銀一錢三分五厘，秋不征米；秋班每百畝秋征米二石一斗六升零、征銀一錢三分五厘，夏不征麥。又倉斗比市斗減三升，遇荒每石折銀六錢。此明時之制也。清初如明制。

所謂「全征」，按照建文四年（1402）制定的科則，是每屯田一分，應徵「正糧」十二石聽屯軍支用，另徵「餘糧」十二石供本衛官軍俸糧。洪熙元年詔免餘糧一半，正統二年又免正糧上倉，只徵餘糧六石，此後即以屯田一分納糧六石爲準。⁵³ 潼關衛屯地分散各處，兼且土地磽薄，只能採取部分本色、部分折色的方法。而由「遇荒每石折銀六錢」反推回去，可知平時改爲折銀的一錢三分五厘甚至不足二斗五升，合本色尚不足二石半。加之倉斗又比市斗少三升，潼關衛屯的實徵額是遠低於法定額的。

⁵¹ 按：本文前言引萬曆《華陰縣志·輿地·附潼關衛》卷一，頁5b-6a，指出明代潼關衛城中的居民並非全屬軍籍，也有不少民戶。上引康熙《潼關縣志》中所謂的「民」，有無可能指的是隸屬於華陰縣的民籍呢？答案應是否定的。蓋筆者所見之康熙《潼關縣志》，其實原本是《潼關衛志》；志中原作「衛」之處多被後人挖改爲「縣」，例如是書卷中，頁1a，〈職官〉有云：「置關以來，漢唐宋諸代官制皆不可考。至明設縣弁世官：指揮使四員」云云，其中的「縣弁」即是將「衛弁」挖改後的結果。康熙《潼關衛志》筆者未見，但二〇〇一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之《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西北卷》第10冊收有康熙《潼關衛志》中有關人物傳記的部分，比對筆者所見之康熙《潼關縣志》，其內容、卷頁完全相同。何況康熙年間潼關衛尚未改縣，何來縣志之有。因此可以推定，上引文中的禁「民」私鬻、聽「民」鬻之、窮「民」希圖鬻利，指的都是潼關衛丁。另外，關於「每夫授田百畝」一事，王毓銓曾指出：「陝西在洪武間屯田軍每軍額地一頃。除寧夏鎮有五十畝一分的（想即水利灌溉地帶），還沒有發現少於百畝的例外」，可供參考；見《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74。

⁵² 羅侍郎，不知何所指。康熙《潼關縣志·職官·名宦·邊詢》卷中，頁2b，有云：「時羅侍郎清丈屯田擾民，公力抗之」。邊詢任潼關兵備時間不詳，由殷學（嘉靖二十九年任，參見《明世宗實錄》卷三六五，頁4b，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乙未）—張翰—徐貢元（嘉靖二十年進士；參見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953）—邊詢（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同前書，頁1174）的順序看來，當在嘉靖晚期；參見康熙《潼關縣志·職官·兵憲》卷中，頁3b。

⁵³ 參見王毓銓，《明代的軍屯》，頁130-132。

上引嘉靖《陝西通志》於西安府下開列潼關衛屯地二千七百二十九頃零、屯糧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石零，其屯糧應是以每分屯田六石算出的法定額而非實徵額。康熙《潼關縣志·田賦》所載的糧額既沿用至清初，應係萬曆清丈以後的實徵額。⁵⁴但潼關衛屯田尚有分佈在河南閩鄉、靈寶二縣者，其額數並未記入西安府下。根據乾隆年間出任河南巡撫的葉存仁所上，〈奏為豫陝兩省田賦版籍宜歸畫一辦理摺〉（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一月二十七日）所云：⁵⁵

臣查陝省潼關廳地方，原係衛所管轄，七十二屯散處。豫省靈寶三屯，共計一百一十九戶；又閩鄉二十四屯，約計屯民三千餘戶。屯地四百二十四頃零，共征糧一千八百餘石，征銀二百二十兩零，草一萬五千二百餘束。其餘各屯俱在陝省。

可知到了乾隆年間，潼關縣復又改為潼關廳以後，河南地區尚有原潼關衛屯地四百二十四頃零。其中在靈寶縣的約三十頃零，⁵⁶其餘都在閩鄉縣。

⁵⁴ 查張學顏等撰，《萬曆會計錄》（四三卷，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2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十年刻本縮印，1988〕），卷三八，頁23b，〈屯田·北直隸各衛所〉；及卷三八，頁63a，〈屯田·河南都司〉，分別列有潼關衛屯地三千零八十四頃零與二千六百五十頃零，糧額分別是一萬九千零七十九石零與一萬五千九百零五石零。〈北直隸各衛所〉潼關衛下還另有「折色糧并新增地銀」一千二百六十兩零，唯此項數字不見於〈河南都司〉下。按：《萬曆會計錄·屯田》將同一衛所分列兩處的情形並不罕見，如歸德衛，即並見於是書卷三八，頁42a，〈南直隸各衛所〉及頁63a，〈河南都司〉。但兩處開列的數額相同，卷三八，頁42a並載明：「衛屬河南，田坐直隸地方，兩處互載」。準此，萬曆年間的潼關衛既為直隸中府衛所，如按治所在地分，應列於陝西都司下；按所屬機構分，亦應列於南直隸下，《萬曆會計錄》的列法完全不合常理。再回頭看歸德衛，據嘉靖《歸德志·田賦志》卷三，頁3a-b, 6b，可知歸德衛的屯地都在歸德州；卷五，頁25b-26a，〈職官志·都御史劉大謨歸德衛軍政掌印題名記〉謂歸德「以衛屬直隸，州屬河南，犬牙交制，軍民互處」；而《明史·兵二·衛所》卷九〇，頁2213亦將歸德衛列於直隸中軍都督府屬下，可知歸德衛是地坐河南的直隸中府衛，《萬曆會計錄》的說明卻恰恰相反。再者歸德衛的屯糧額數為頃畝數的六倍，亦顯示出《萬曆會計錄》的數字不過是法定額（屯田一分百畝，徵糧六石）而非實徵額。從以上各點看來，《萬曆會計錄》中有關屯田的記載是相當不可信的。但何以出現諸如潼關衛的離譜現象，仍有待進一步考索。本文因此不採用《萬曆會計錄》中的數字。又，嘉靖《歸德志·建置志·署制》卷二，頁6a，謂歸德衛「屬直隸中都留守司，於內隸後軍都督府」，其義亦難解。只能說直隸五軍都督府衛所的所屬似乎都曾經歷過一番大變動，亟需深入研究。

⁵⁵ 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第19輯，頁717-719。

⁵⁶ 參見嘉慶《續潼關縣志·田賦》卷上，頁19a-b。

潼關衛屯地總數達三千餘頃，以一分田百畝計，屯軍人數當在三千以上。中期以後，應全數改由軍餘、佃戶耕種。屯地集中、屯戶聚居的地方就稱作「屯」。關於明代潼關衛屯的數量，葉存仁的奏疏指出有七十二屯，其中在靈寶的有三屯，在閿鄉的有二十四屯。康熙《潼關縣志·建置·編屯》卷上則錄有一百零八屯的屯名（圖二），其中坐落於閿鄉縣的有二十九屯，靈寶縣一屯，華陰縣二十八屯，華州一屯，渭南縣一屯，臨潼縣二屯，同州二十三屯，朝邑縣九屯，郃陽縣十四屯。而嘉慶《續潼關縣志》卷中，〈人物〉，記該衛掌印指揮李文煥之惠政云：

衛屯田多散寄百里外，歲納籽粒苦轉輸，更苦須待；文煥令納糧者便兌支糧之家，上無出入之奸，下免阻滯之患。又息踐更雜役，督造軍器精利，在任十五年，衛人德之，七十二屯皆建祠祀焉。

推想七十二屯是明代官方的數據；入清以後互有消長，⁵⁷ 至康熙而總數增至一百零八屯。⁵⁸

七十二屯分散各地，除閿鄉、靈寶二縣在河南，屬河南府之陝州；渭南、臨潼為西安府屬縣，華陰為華州屬縣，朝邑、郃陽為同州屬縣，同、華二州俱隸屬於西安府。李文煥的改革採「兌支」之法，讓「納糧者便兌支糧之家」，不但免去倉官的剝削，也讓屯戶直接對操守軍負責，獲得衛軍的好評。

兌支法推行的時間或不久長。康熙《潼關縣志》卷中，〈職官·兵憲·丁啓睿〉云：

時關米價騰踊，官多私折米價。公訪知，置屯官於法，令經歷司掌冊，屯官簽判，日以收數具報，領到封封廩。私折之弊遂絕。

⁵⁷ 例如華陰縣，康熙《潼關縣志·建置·編屯》卷上，頁12a-b，謂其有二十八屯；萬曆《華陰縣志·輿地》卷一，頁4b，則開列「潼關衛隸縣軍屯」三十三屯屯名。而陸維垣重修，李天秀纂，乾隆《華陰縣志》（二二卷，首一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十七年重鉛印清乾隆五十三年本），卷一，頁13b-14b，〈封域·里社〉，沿襲前志，仍開列潼關衛三十三屯名，並謂其「星占各里，里民視之若贅疣」。

⁵⁸ 按：嘉慶《續潼關縣志·編屯》卷上，頁10b，謂：「原屯一百九，錯落靈寶、閿鄉、臨潼、渭南、大荔、華州、朝邑、郃陽、澄城、華陰各州縣」。大荔係雍正十三年以同州地改置，嘉慶二十四年由渭南改撥潼關衛屯地四十六畝零與大荔；參見何耿繩重修，姚景衡纂，道光《重輯渭南縣志》（十八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道光九年刊本），卷八，頁3b，〈賦稅考〉。澄城在明代時隸屬於西安府同州，雍正十年來屬同州府。可見康熙以後屯營數仍持續有變動。

李文煥任潼關衛指揮約在萬曆二、三十年代間，⁵⁹ 丁啟睿出任潼關兵備副使則在崇禎九年前後，⁶⁰ 當時收糧工作已回歸屯官手中，卻因多行不法，經丁啟睿責令潼關衛經歷一同分擔錢糧徵收的工作。然衛弁收屯糧，長久以來皆「闊斛口以咨侵剋」；崇禎十五年，監軍道僉事喬遷高出署潼關兵備道，革其積弊，製收糧斛，斛口依周尺，實六寸，「出入準之，民受惠焉」。⁶¹

再看京操。潼關衛軍在永樂遷都北京之前就曾奉命扈從車駕巡狩北京，其後屢被徵調，⁶²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確立以外衛官軍更番京操的制度，⁶³ 潼關衛軍應該是最早參與京操的衛所之一。英宗即位之初，雖一度因北邊邊防告急，將京操軍調還原衛，另派衛軍往寧夏備禦，⁶⁴ 但由前引崇禎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⁵⁹ 據嘉慶《續潼關縣志·人物·奇勳》卷中，頁32a-b，文煥受業於盛訥，與訥子以宏相知。盛訥係隆慶五年進士，盛以宏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李文煥死後，子思和襲職。《潼關碑石·李母范氏墓志銘并蓋》記思和妻范氏，生於隆慶四年，既歸李氏，文煥「樂有佳兒婦，乃得一意治衛事。握衛篆一十五年，百廢俱舉，軍民胥悅」；同書〈盛厚子趙碩人合葬墓志銘并蓋〉後附有編者按，謂「王之臣：明萬曆乙未（二十三年）進士，由指揮李文煥游擢山西古城道」。綜合上述，判斷李文煥任潼關衛指揮約在萬曆二、三十年代間。以上參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頁1834-1835；嘉慶《續潼關縣志·人物·承襲》卷中，頁36a；《潼關碑石》，頁121-122, 118。

⁶⁰ 據《明史·列傳·丁啟睿》卷二六〇，頁6740：「丁啟睿，永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初，歷山東右參政，坐事謫陝西副使。九年，寧夏兵變，啟睿捕斬殺巡撫王樞者首惡六人，軍中大定」。《崇禎實錄》卷九，頁2b，崇禎九年二月乙酉：「寧夏卒飢索餉，殺巡撫右僉都御史王樞，兵備副使丁啟睿撫定之」。又據孫傳庭，《白谷集》（五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二，頁20a-24a，〈題潼關設險合兵疏〉，可知崇禎十一年時丁啟睿仍為潼關兵備道按察使。

⁶¹ 參見康熙《潼關縣志·藝文·監軍喬公傳》卷下，頁48b-49b；卷上，頁21a，〈田賦·屯糧〉。

⁶² 參見《明太宗實錄》卷一三五，頁3a-b，永樂十年十二月乙亥；卷二三九，頁1a，永樂十九年七月癸亥。

⁶³ 參見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頁52-73。

⁶⁴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一〇，頁4a，宣德十年十月丁未；頁7a，宣德十年十月丙辰。川越泰博認為明代京操軍（班軍番上軍）確立於正統元年前後，其後出現的邊操軍（班軍番戍軍）大抵由京操軍轉任。初期係以「下班」之京操軍赴邊操備，弘治十二年以後，隨著京操軍的「番戍軍化」，原本同時負擔京操、邊操的班軍得以免去京操，成為純粹的邊操軍，此後邊操軍才成為固定之軍種；見〈明代班軍番戍考〉(3)，《歷史における民眾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2），頁416-423。其說有待檢驗。至少就潼關衛而言，該衛之京操、邊操開始的時間都遠早於正統元年；宣德十年的調動也不是直接將京操軍改為邊操軍，而是先從潼關衛調軍往寧夏，再

〈兵部爲暫免河南班軍十五年秋班事題行稿〉，可知一直到崇禎年間，潼關衛都還保有京操事務。

宣德年間參與京操的潼關衛軍人數達一千二百人，宣德十年十月一旦被調還原衛操守，⁶⁵ 其後變化不詳。萬曆中期只餘秋班京操軍四十三名，⁶⁶ 此後一直維持此一數字到崇禎年間皆未改變。

崇禎年間的潼關衛京操軍似乎也曾有過部分折班的時候。崇禎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兵部爲暫免河南班軍十五年秋班事題行稿〉有云：⁶⁷

察得本省額有京操秋班軍士，出自宣武、河南、信陽、潁川、潁上、潼關六衛所，每年起發赴京工操。今奉明旨，議留京軍一千名以修汴城，隨移會兵備道公同酌議外，該本司覆察：河南衛額有京秋班軍一百六十六名，信陽衛額有京秋班軍四百八十七名，以上二衛被寇破城，軍士傷擄，去歲業蒙題免，今歲未知勾否全額，恐難急濟，弗敢議留。潼關一衛，京軍額止四十三名，為數不多。卷察附近者，惟有宣武衛原額京秋班軍三百三十二名，潁上所原額京秋班軍三百四十七名，以上二衛所共軍六百七十九名。尚有潁川衛原額京秋班軍五百九十二名，即於此數內再抽撥三百二十一名，同前宣武、潁上二衛所軍人六百七十九名之數，共合一千名留修汴省。其潁川衛除留湊修城，即係一半上班外，尚餘二百七十一名，似應折價解部。潼關、河南、信陽三衛催令勾補，遵旨一半上班，一半折價。

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軍攻下洛陽，福王朱常洵被殺。二月進攻開封不成，李自成左眼遭射瞎撤離。七月，羅汝才因與張獻忠不合，率部到河南投靠李自成。兩軍合流後，一路攻下項城、商水、扶溝等豫中州縣。十一月初四日

將京操軍調回原衛。也沒有任何直接證據顯示潼關衛邊操軍係京操軍利用下班空檔赴邊操備，相反的，由《明英宗實錄》卷八六，頁4b-6a，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丙子：「陝西各處更番操備官軍，俱係陝西都行二司并直隸潼關、河南南陽等衛所，率一年一更，其下班官軍惟延綏附近衛所遇河凍仍赴守備，凍解遣還。甘寧操備者俱俟該班日期始赴。切慮所領頭目私受賄賂，縱還原籍者有之，遇警豈能調用。宜將下班官軍直隸寧山及南陽等衛，令本衛正官同原領操官在衛操練，遇邊境用兵，聽陝西鎮守官調遣；其陝西都行二司者令於各衛所操練」云云，可知正統年間的潼關衛邊操軍是單純的邊操軍，絕非下班京操軍的兼職。

⁶⁵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一〇，頁7a，宣德十年十月丙辰：「發潼關衛官軍在京操備者一千二百人還原衛操守」。

⁶⁶ 《兩河觀風便覽·兵防·班軍》卷四，頁43b。參見註42。

⁶⁷ 參見《總匯》41：2990。

克南陽，唐王朱聿鎮被殺。十二月下旬，第二次進攻開封。十五年正月十三日，聯軍沿城牆挖掘大洞埋藏火藥炸城，雖未成功，城牆多少遭受損害。⁶⁸ 崇禎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兵部的題行稿，即是爲了修補開封城牆，議請暫留河南京秋班軍一千名。題行稿中同時提到，在此之前已有明旨，令河南班軍「一半上班，一半折價」，然「潁川衛餘軍與潼關衛額軍約共三百餘名，若一半上班，零星不便督押」，河南都司因請兵部再議，希望能「或准全折，或具題免班」。兵部原擬「信陽、河南、潼關三衛相應遵旨，一半上班，一半折價，無容再議」，但公文尚未發出，隨即又改變主意，以「河南、潼關二衛，驚鴻未集，溝壑多填」，「與其徒事追呼，究無濟事，不如明與暫免，以示休養，俟明歲早行催赴」，最後議准將十五年秋班暫免赴京，十六年秋班嚴行該道、都司預先督催，依期赴工，不得再誤。

第三是邊操。潼關衛軍參與邊操始於永樂初。當時被派往寧夏及東、西、中三路輪班備禦的，有西安左·右·前、西安右護、潼關、寧羌、漢中等七衛及鳳翔守禦千戶所官軍共一萬一千七十六員名。⁶⁹ 英宗即位之初，因北邊多事，爲征勦達賊被調往寧夏備禦。⁷⁰ 正統元年，調赴甘肅勦賊；⁷¹ 二年，以潼關官軍駐甘州者虛糜糧餉，請調莊浪哨備。⁷² 同年，寧夏花馬池築立哨馬營，亦請以潼關衛聽調官軍分撥各營更番哨備。⁷³ 由於班軍赴邊，率一年一更，爲恐下班官軍賄賂所領頭目，縱還原籍，遇警不能調用，正統六年，議令下班官軍於每歲九月中至正月終，仍需由本衛正官率同原領操官在衛操練，每三日一操，其餘時月方可

⁶⁸ 以上參見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128-144。

⁶⁹ 參見胡汝礪編，管律重修，嘉靖《寧夏新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卷一，頁52，〈公署·戍夏行司〉。

⁷⁰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一〇，頁4a，宣德十年十月丁未。

⁷¹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二〇，頁2a-b，正統元年七月辛丑；卷二一，頁1b，正統元年八月丙寅；頁4b，正統元年八月甲戌。

⁷²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三一，頁3b，正統二年六月庚午。

⁷³ 據《明英宗實錄》卷二二，頁8b，正統元年九月乙巳：「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史昭奏：寧夏城池屯堡營墩俱在黃河之外，備禦西北一帶，其河道迤東至察罕腦兒直抵綏德，沙漠曠遠，並無守備，擬於來春相地於花馬池築立哨馬營，增設煙墩，直抵哈剌兀速馬營。從之。昭又請以都指揮姚琛，率原領潼關衛聽調官軍，分撥各營更番哨備。上以琛先已別有調遣，命行在兵部更選都指揮一員委任之」；當時花馬池營尚未設立，潼關衛軍仍在甘州守禦。

休息。遇邊境用兵，聽陝西鎮守官調遣。如無警報，依限赴操。⁷⁴ 十年，以寧夏、延安軍少，復遣官於河南都司屬衛并潼關衛揀選精勇者三千人，分爲二班；寧夏增一千、延安增五百。仍委公正有勇略都指揮提督訓練，以候調發。十二年，寧夏總兵官黃真等奏乞將河南及直隸潼關等衛原選操官軍三千，半往寧夏，半往延安備冬，候春凍開放回原衛，歲以爲常。兵部議覆不准，只許河南并直隸潼關等衛官軍於邊警時調去策應。⁷⁵ 景泰元年（1450），因河東達賊欲來犯邊，寧夏兵不敷調用，將河南都司、直隸潼關等衛所現操聽候策應官軍三千俱調寧夏總兵官張泰處操備，併力殺賊。二年，調直隸潼關衛官軍二百八十五員往寧夏守備。⁷⁶ 大體說來，這時期的潼關衛邊操軍爲因應北邊局勢的變化，駐地時有更換，其足跡遍及甘州、莊浪、寧夏、延安等地。而到了天順年間（1457-1464），不少原本被調來備冬的衛軍已成爲常備軍，長期駐守在延綏之雙山堡等處了。⁷⁷

成化初年，潼關衛班軍原備邊甘肅者二千八百零五人經兌換歸併，改爲就近操守延綏。六年，甘肅巡撫徐廷章奏請調還甘肅，照舊輪班操備。⁷⁸ 但這時期潼關衛邊操軍的主要戍守地區還是在延綏榆林一帶，人數多達三千二百六十五員名。⁷⁹ 同時期潼關衛軍還不只活躍於北邊戰場上，⁸⁰ 尚有被派往荆襄一帶平賊者。⁸¹

潼關衛軍備禦延綏者，歷年以來都是「自十二月初上班，既周一年，又至次年三月始得下班」，以致在邊之日遠多於在家之日。弘治十七年，改以三月初爲上下班之期，歲一番休，行糧全支本色。⁸² 但到了正德四年，又因邊防需要，

⁷⁴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八六，頁4b-6a，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丙子。川越泰博，〈明代班軍番戍考〉（3），頁414引此條，以爲陝西鎮的番戍班軍約始於正統六年前後，其實應更早。

⁷⁵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一二九，頁1b，正統十年五月丙子；卷一五七，頁3b，正統十二年八月己巳。

⁷⁶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七，頁12b-13a，景泰元年正月乙未；卷二〇六，頁8a，景泰二年七月己未。

⁷⁷ 參見《明英宗實錄》卷三五二，頁4a-b，天順七年五月甲寅。

⁷⁸ 參見《明憲宗實錄》卷五一，頁4a，成化四年二月癸卯；卷七八，頁1b-2b，成化六年四月甲寅；《明經世文編·徐中丞奏疏·甘肅邊備疏》卷七〇，頁5b-7b。

⁷⁹ 參見《明憲宗實錄》卷九九，頁20a-b，成化七年十二月甲午；《明經世文編·涂司馬撫延疏草·及時議修內政治實政事疏》卷四四七，頁10b-11a。

⁸⁰ 參見《明憲宗實錄》卷一四〇，頁4a，成化十一年四月壬辰。

⁸¹ 參見《明憲宗實錄》卷一〇三，頁9a-b，成化八年四月癸巳。

⁸² 參見《明孝宗實錄》卷二一三，頁6a，弘治十七年六月乙亥。

將下班操備官軍存留於延綏。⁸³ 正德十四年，命分調潼關官軍千人防禦延綏，餘留本關盤詰。⁸⁴

嘉靖以後，班軍免班改納「折班銀」之議陸續出現，也逐漸付諸實行。嘉靖四十三年，延綏巡撫胡志夔因河南番戍之卒孱弱不堪，奏請免戍三年，每年每軍徵銀五兩四錢，解鎮供募軍之用，限滿仍復上班。⁸⁵ 當時在延綏鎮參與邊操的，有潼關衛額軍三千二百六十五員名、西安四衛官軍四千三百員名、蒲州所官軍六百五十五員名、南陽衛官軍二千七百八十二員名、潁上所官軍六百二十三員名，以及寧山衛官軍一千零四員名，⁸⁶ 南陽、潁上、寧山三衛所邊操班軍因此獲得免戍三年。萬曆三年，折班之議再起，據《明神宗實錄》卷四三，萬曆三年十月戊寅：

初兵部郎中熊秉元所陳四事。……一、處班軍以濟實用，行陝西總督石茂華勘奏。議上，兵部覆奏：惟班軍一議，謂西安班軍宜選為兩班戍守，潼關、蒲州二衛離邊不遠，亦應照舊上班以助工役，南陽等衛軍夫脆弱，且不依期赴邊，宜徵銀解銀以資修守，如郎中議。……上從部議。

似乎西安、潼關等衛仍被排除在折班名單之外。唯據同書卷二三九，萬曆十九年八月丁未：

延綏鎮逼鄰虜巢，最稱衝要，原有陝西西安四衛官軍、河南南陽等衛官軍共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六名，各輪班赴鎮，與營堡官軍相兼戰守。後各扣銀解鎮，以備邊用，暫令免班。其後城堡邊垣年年損壞，只以本鎮戰兵修除，工作疲勞。至是，撫臣賈仁元奏請將西安四衛、潼關、蒲州衛所官軍

⁸³ 參見《明武宗實錄》卷四八，頁9b，正德四年三月丁巳。

⁸⁴ 參見《明武宗實錄》卷一七六，頁7a，正德十四年七月丙午。

⁸⁵ 按：《明世宗實錄》卷五三五，頁2b-3a，嘉靖四十三年六月癸酉：「兵部覆延綏巡撫胡志夔條陳防守事宜……一、河南南陽等衛番戍之卒孱弱不堪，請如大同例，得便宜發銀募軍。從之」。其中並未提及潼關衛。譚吉璉纂修，康熙《延綏鎮志》（六卷，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乾隆增補本影印，1996），卷二，頁7b，〈兵志·軍數舊額〉，記延綏鎮班軍來自西安左·前·後·右、潼關、南陽等衛，「兩班計一萬一千六十三員名。嘉靖三十一年奏冊尚仍舊。其後南陽、潁上、寧山三衛軍免班。南陽等衛軍戍榆，歲二月赴邊，次年二月放歸。嘉靖四十三年，巡撫胡志夔疏議免戍三年，每年每軍徵銀五兩四錢，解鎮募軍之用，限滿仍復上班。萬曆三年，閱邊郎中熊秉元、總督石茂華、巡撫張守中會議照舊徵銀以資公費，而班軍之制廢矣」。這段文字應是針對南陽、潁上、寧山三衛的敘述，三衛免班始於嘉靖四十三年，三年後復班，萬曆三年再免，此後不再復班。

⁸⁶ 各衛參與延綏鎮班軍額數，參見《明經世文編·涂司馬撫延疏草·及時議修內政治實政事疏》卷四四七，頁10b-13a。

逐名揀選，照舊赴邊；其南陽、潁上、寧山三衛所仍聽徵銀解鎮，每名以原徵額銀五兩四錢為率。若以虜情緊急，另議通行調取，庶舊制不隳，衛邊有裨矣。章下所司。

可知在萬曆十九年之前，延綏鎮各衛班軍確曾一度全面改為折班。⁸⁷ 然據同書卷四三一，萬曆三十五年三月辛巳：

覆延綏巡撫涂宗濬陳安邊四事。……一，清班價以裕城守。兵部覆上二事，……其清班價者，曰：延綏一鎮邊長千里，而防兵僅五萬有奇，先年調集西安、潼關、蒲州、南陽、潁上、寧山各衛協防，嗣以各衛遠近不等，西安三衛稍近，准留戍守，南陽三衛稍遠，議扣月糧徵解資修。

顯然潼關衛終究還是恢復了協防戍守的任務，只是中間幾經反覆，詳細情形已不可考了。

最後看巡捕。潼關衛配置巡捕衛軍人數不詳，湯斌在《湯斌集·湯子遺書》卷七，〈陝西潼關副憲公移·再行嚴禁私販茶馬事〉中，記清初「潼關衛巡捕千總」，應「督率兵快人等，務要晝夜盤查，凡關城內外，河濱禁溝等處，遇馬販茶徒，但無部單引票者，無論係何衙門差遣，係何營兵丁，俱即刻擒拿申報」，⁸⁸ 略可見其功能。而茶馬之外，潼關亦是私鹽興盛之地（詳下文），巡查私鹽也應是巡捕重要工作之一。

潼關衛轄下另有大慶關、風陵渡與永樂鎮三巡檢司，⁸⁹ 其屬下弓兵應與衛所巡捕軍互相配合巡捕事務，惜分工情形不詳。

⁸⁷ 按：實錄此處僅提及「陝西西安四衛官軍、河南南陽等衛官軍」，未及潼關衛；但由總人數「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六名」，比照本文前引涂宗濬，《明經世文編·涂司馬撫延疏草·及時議修內政治實政事疏》所列延綏鎮班軍總人數（西安四衛4300+潼關衛3265+蒲州所655+南陽衛2782+潁上所623+寧山衛1004=12629），可知潼關衛確曾一度「扣銀解鎮，以備邊用，暫令免班」。

⁸⁸ 參見湯斌著，范志亭、范哲輯校，《湯斌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上冊，頁386，〈湯子遺書〉。

⁸⁹ 《明太宗實錄》卷八四，頁4b，永樂六年十月乙未：「改陝西朝邑縣大慶關巡檢司、山西平陽府風陵〔陵〕渡、永樂鎮二巡檢司隸潼關衛」。宮崎洋一，〈十八世紀中国の行政変革の特質—清朝乾隆期の山西省の事例を中心に—〉，《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1（1993）：43，表二「巡檢の变革」，列有蒲州府永濟縣風陵渡與永樂二巡檢司，謂前者設於雍正年間，乾隆四年改屬潼關；後者設於清初，後裁。實則二司自永樂六年以來一直到雍正二年潼關衛裁併，都在潼關衛轄下，雍正二年一度改歸永濟縣；五年復設潼關縣，仍屬潼關。

潼關衛軍於宣德初尙有漕運之職，因「每歲以路遠來遲，有誤運糧」，於宣德五年三月改以河南宣武等衛所清出寄操旗軍代之。⁹⁰

潼關衛軍除軍役之外，另有雜費負擔。雜費初無定額，民不堪其苦。萬曆二、三十年代間，衛指揮使李文煥「均徭役、清浮糧、措供廩膳」，獲得衛人擁戴。⁹¹至萬曆四十年代初，衛人孫振基「慨民窮賦重，率士紳敷陳當事，創均徭法，大厘宿弊」，「民喜更生」。各屯爲之建祠，祀之鄉賢。⁹²當時諸項費用中，以「力差煩苦」最爲民擾，兵備副使馮盛明「條鞭均徭，徵銀雇役，潼人以蘇」。⁹³

四・潼關衛與鄰近州縣間的關係

潼關衛屯地分散在閿鄉、靈寶、華陰、華州、渭南、臨潼、同州、朝邑、邵陽等九州縣境內，屯民聚居於「屯」內，形同化外之民，爲當地州縣帶來許多困擾。就中又以華陰、同州、閿鄉三地因屯地比例較高，問題更爲嚴重。萬曆《華陰縣志》卷一，〈輿地〉：

蕞爾華壤，幅員幾何，而軍屯又碁置其間，民田之可耕者益寡矣。且軍田佃于民，不二三年復轉佃焉，朝收其糧，暮更它主，奈之何民不窮且蹙耶？先是，軍人梗化，多蠹賊其中，兵使者文公球傳檄所在軍屯，訟歸有司，稍得其平而無跋扈矣。

就直言「軍田轉佃」與「軍人梗化」，是地方政府必須面對的兩大問題。⁹⁴天啓

⁹⁰ 參見《明宣宗實錄》卷六四，頁13b-14b，宣德五年三月己巳。

⁹¹ 參見康熙《潼關縣志·職官·印官》卷中，頁9b。

⁹² 參見《潼關碑石·孫振基墓志銘并蓋》，頁114-116；康熙《潼關縣志·人物·鄉賢》卷中，頁14b。孫振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四十年授戶科給事中，因每疏言多訐直，外轉山東僉事，尋以憂去，四十四年卒於家。又見乾隆《同州府志·人物志》卷三七，頁30a；《明史·列傳·孫振基》卷二三六，頁6153-6155。

⁹³ 馮盛明事蹟參見康熙《潼關縣志·職官·兵憲》卷中，頁5a。馮盛明任職時間不詳，據《明實錄》，馮盛明於萬曆四十年出任山東副使，四十五年由陝西參政陞河南按察使，推斷其任潼關兵備當在萬曆四十年代初，與孫振基丁憂在家時期重疊；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明實錄》（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jiquery?@@1698200596>〔搜尋，2008.06.02〕）。

⁹⁴ 文球任潼關兵備道在萬曆三十年代末期至四十年代初。參見《明神宗實錄》卷四九九，頁7a，萬曆四十年四月己丑：「陞陝西副使文球為山西參政」；卷四九九，頁5b，萬曆

《同州志》⁹⁵ 卷五，〈食貨·田畝〉：

州南走沙，北錯鹵确，中行雖渭，歲害稼。其督亢無幾何，而西安、潼關諸軍屯復螳錯而食其腴，以故方六七十，曾不得飽。

則對軍田與民田錯處，而軍田多腴、民田多瘠以致民生困乏表示無奈。順治《閿鄉縣志》⁹⁶ 卷二，〈田賦·屯田〉：

閿地褊小，錯居潼關、弘農間，諸屯遠無鈐轄，故易以肆期恣睢。訟則虞芮，鬪則邱季，爭桑則吳楚，跋扈則負嵎，民之罹虐，由來漸矣。雖曰：御得其道，蔡人即吾人。然民地之詭入于軍戶者日益眾，距違〔遠〕輸納，時為民累；嘯聚拒捕，乃其常態。軍強民弱如此，而所隸者或委之鞭長不及馬腹，甚且庇其私屬而異視吾民，抑獨何歟？馬店、姚青、東呂每每負賦以累有司，是可憂也。

說的也不外乎是軍戶隱占民地，影響賦稅收入；以及軍人恃強不法，衛官包庇犯罪等現象，與華陰大同小異。但另一方面，相較於華陰、同州、潼關俱在陝西西安府境，閿鄉或因地在隔省之故，問題更顯棘手。這可從方志中遺留下來的豐富資料略窺一二。

以水資源的爭奪為例。位在閿鄉縣西境的西董村因地勢太高無法鑿井，飲水必須仰賴二十餘里外的泉水。村民不堪遠地取水之苦，聯合寺角營等九村人民共同購地納課，引泉水築成西董渠。宣德間，西董渠為潼關軍豪奪為陂塘，民失其利；弘治間，縣民郭苛訟於官，渠得歸村民，當時有崔譽將事件經過刻記於石。嘉靖間，潼軍復佔渠，潼關兵備張副使根據碑石記錄，⁹⁷ 復斷歸村民。及萬曆四十七年，九村居民再立碑石，言明：「如南歇馬一日一夜、北歇馬二日一夜、留郭村二日二夜、漢井等村五日五夜、西董村照常食水。凡十有五日而一

四十年九月壬寅：「覆陞山西參政文球仍備潼關兵事」；卷五五〇，頁3a-b，萬曆四十四年十月辛亥：「陞山東按察使文球為山西右布政」。

⁹⁵ 張一英修，馬樸纂，天啟《同州志》（十八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天啟五年刊本攝製）。

⁹⁶ 張三省、楊遵修，杜允中等纂，順治《閿鄉縣志》（六卷，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2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順治十一年刻，順治十六年、康熙五年增刻本影印，2007〕）。

⁹⁷ 嘉靖間出任潼關兵備副使的有兩位姓張，一為張問行，嘉靖十六年任；一為張翰，任期不詳，但其前任之殷學係嘉靖二十九年任。參見《明世宗實錄》卷二〇〇，頁1b，嘉靖十六年五月丙戌；卷三六五，頁4b，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乙未；康熙《潼關縣志·職官》卷中，頁3a-b。

週。其近泉而有井可汲者，不列於碑，不渠食」；為各村分水時日做了最詳盡的規範。

康熙九年（1670）九月，大留屯潼軍因關廟立會，向西董渠借水三日。其後沿為慣例，每歲借水三天。雍正四年（1726），大留潼軍意圖改為每月分水三日，軍民雙方衝突再起。西董村方面以生員郭元漢為代表，大留屯則以周紋為首，相互訐訟達十五年之久。乾隆四年（1739），閩民郭璉為潼軍毆斃，終於驚動豫、陝雙方大員共同出面處理。根據梁溥在〈西董渠圖說〉的記載：

乾隆六年，河陝汝道張因會勘，議大留屯本不應食渠水，念其艱於取汲，令改修水斗，以石代木，節滲漏之水，於原派外，給大留屯一日一夜。詳豫撫雅、陝督尹，積案始定。

解決方案乃是命大留屯民出錢將木斗改為石斗，將原本因使用木斗滲漏掉的水節省下來，「於九村原派日期十五日一輪外，分給一日夜與大留村」。⁹⁸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潼關衛早已撤廢，但閩鄉境內的潼關衛屯仍歸潼關縣管轄（詳下節），因此儘管大留屯與西董村都在河南省閩鄉縣境內，屯與村之間的糾紛仍需知會河南巡撫與陝西總督雙方，始能定案。

再以戶口食鹽為例。潼關衛與鄰近的西安府屬，同州、華州屬，以及河南陝州屬俱行河東引、食河東鹽。⁹⁹ 根據時人的觀察，河東行鹽區「最宜防者：水陸交通之地，舟車接運。極難查者：軍民雜處之區，縣衛異商」。潼關兼具二者，又地處三省交界，因此不僅是東北邊的山西芮城縣「有潼關對渡私販」之苦；東邊的河南閩鄉縣也常藉地利之便，通過潼關販賣自家生產的私鹽。而居住在閩鄉境內的潼關衛軍戶，也多加入走私的行列。¹⁰⁰《勅修河東鹽法志》卷五，

⁹⁸ 參見劉思恕纂修，王守恭等編纂，光緒《閩鄉縣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刊本），卷首，頁16b-17a，〈圖考說·西董渠圖說〉；卷二，頁16b，〈建置·隄渠〉。又見趙希曾纂修，孔廣聰增修，光緒《陝州直隸州志》（十五卷，首一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七年刊本），卷一，頁34b-35b，〈輿地·水利〉。

⁹⁹ 河東池鹽產量不多。其行鹽區僅河南省之南陽、河南二府屬，汝、陝二州屬，與許州之襄城；山西省之平陽、潞安、澤州、蒲州四府屬，解、絳、吉、隰四州屬；以及陝西省之西安一府屬，興安、同、商、華、耀、乾、邠七州屬。參見覺羅石麟總纂，《勅修河東鹽法志》（十二卷，收入《中國史學叢書》第45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清雍正本影印，1966〕），卷三，頁2a-b, 7a-8a, 12a-b, 15a-b，〈引目〉。

¹⁰⁰ 參見《勅修河東鹽法志·律例·附禁緝事宜》卷五，頁38b, 40a, 41b。閩鄉私鹽問題嚴重，其中有很大一部份係受到潼關屯民雜處影響。卷一〇，頁27a-29a，〈疏議〉，田文

〈律例·附禁緝事宜·禁緝阻塞〉有云：

閿鄉縣專燒蓬淋鹵，刮土煎私。更兼蒲州、潼關止隔一河，私鹽北越，或在芮城，或在河北楊家灣，或在盤豆，或在十二河口，夤夜放船。閿鄉縣背河面山，東西不過八十里，其間有潼關衛軍戶十數家居住，不由閿縣管轄，不食縣鹽，每多私販。

按：潼關衛在康熙十八年派定鹽引一百三十三道以前，原本是沒有額引的。各軍各依所在州縣食鹽，是即所謂的「隨地食鹽」。然而，屯居閿鄉的潼關衛軍，卻因不受閿鄉縣管轄，「不食縣鹽」，引發了莫大的糾紛。

據光緒《閿鄉縣志》卷四，〈田賦·鹽法〉，〈潼軍改食閿鹽咨文錄〉（乾隆六年）：

伏查今潼向為潼關軍衛，共七十二屯，散處州縣。而閿鄉縣則有二十二屯。從前鹽制，年遠難稽，至康熙十八年，始奉文將潼軍每十丁派設一引，計引一百三十三道。後又增引三道。此引隨丁設，自應軍食引鹽。舊制彰彰，本無可議。但潼軍之寄居各州縣者，屯數有多寡之不齊，道路有遠近之各別，是以如靈寶、大荔等處雖皆隨地食鹽，而就近之閿邑與華陰、郃陽各屯，則歷今皆食潼鹽。蓋以閿潼接壤，臨河之楊家渡，即為潼軍居住之屯地，凡潼軍在閿，非其管轄，相距縣城頗遠，並無事故往來，平日完糧納課，俱仍在潼邑，赴潼之便，即向店買鹽帶歸，以供日食之需，習以為常。兼之潼商捆載鹽觔，腳價減省，較之閿鹽，賣價亦有低昂。……小民計利，析及錙銖，既有貴賤之分，雖毫釐亦所必爭，以致兩邑案牘紛紛。

可知康熙十八年分派潼鹽，是以十丁潼軍派鹽一引來計算的。當時定下潼關額引一百三十三道，後又增引三道，合為一百三十六道。本來潼軍按照規定「隨地食鹽」，是沒有必要另設額引的，但因「關城內外居民兵役以及商賈往來不能食」，才酌設鹽引一百三十六道。這個數量與鄰近的華州華陰縣二千九十六引、

鏡，〈遵旨查議疏〉（雍正七年）即指出，河東行鹽地「惟閿鄉一縣界連山陝，屯民雜處，向因私鹽叢積，官鹽壅滯」。又見蔣兆奎，《河東鹽法備覽》（十二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輯，第2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影印，1997〕），卷九，頁29b、32a，〈律例門·附禁緝扼塞〉；卷一一，頁29a-31a，〈奏疏門〉。

山西解州屬芮城縣二千二百零四引、河南陝州屬閿鄉縣三千九百零五引相較，差距不爲不大。¹⁰¹

潼關衛與閿鄉縣之間的爭端主要出在兩地鹽價不同。根據閿鄉知縣祖廷梁的調查，閿鄉鹽價在雍正六年以前是每觔紋銀一分一釐，經商民兩次控告，至乾隆四年，原擬比照潼關縣現行鹽價，減爲每觔八釐，但因運商不滿鹽價驟減，虧折苦累，聯名具控，最後定爲每觔九釐。閿鄉運程較遠於潼關二百里，兩地價差一釐，符合比例原則；但對潼軍而言，一釐之差不爲小，何況加上腳價以後，每十觔閿鹽較潼鹽高出三分九釐有零，自然要捨閿鹽而就潼鹽。潼軍平日完糧納課俱在潼邑，趁往返之便，買潼鹽帶歸，也不致增加額外的負擔。然而，潼軍食潼鹽直接造成閿鹽的滯銷，閿鄉縣因此一再申請潼軍改食閿鹽。

閿鄉縣的主張很簡單。既然「隨地食鹽，原爲通議」，那麼在閿鄉的潼軍自然就應食閿鄉之鹽。但潼關知縣也有意見，他以爲，潼關既有額引，「潼軍遵照定例，按引食鹽，歷年已久，未便更張」；且若改食閿鹽，勢必帶來潼鹽滯銷的問題。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陝州知州因而提出折衷方案，議請由閿鄉代潼關分銷潼引四分之一，借以換取潼軍「隨地食鹽」。

本案經河陝汝道張學林多方查證，竟然查出潼關銷鹽情形有異乎常情的怪現象。配合調查的河東鹽運司在回移內指出：

潼邑額引僅一百三十三道，加引三道，而每年行銷外，請撥餘引多以千計。乾隆五年，請撥餘引竟至三千七百，多於正額幾三十倍。如此而猶慮正引難銷，商賠課而官累考耶？

潼關知縣堅持「潼引按丁起課，若不令食潼鹽，則額引難銷」；鹽運司官員則質疑：以十丁一引計，乾隆五年潼關縣於原引一百三十六之外另請撥餘引三千七百，「豈潼丁驟增三萬六七千之多耶？假非借以行私，不知若許之餘引銷於何處」？河陝汝道因此認定：潼關「商丁仗官庇而肆行，官商假丁眾而罔上」，前此之藉引行私，不與究問，已爲厚幸；所請「按引食鹽」，有損「鹽法正體」，應「照運司原議，隨地食鹽」。至於陝州所議代銷潼引四分之一事，絕無必要，應無庸議。

同時間，陝西方面由同州府題給潼商道的調查意見中，針對「隨地食鹽」一事也已達成共識，但仍請「食鹽從閿，鹽價從潼」，也就是希望潼軍能按潼關

¹⁰¹ 參見《勅修河東鹽法志·引目》卷三，頁2a-b, 7a-8a, 12a-b, 15a-b。

鹽價購買閩鄉鹽引。這一部份經河東陝西都轉運鹽司勅管鹽法道張任判定：「應無庸議」。¹⁰²

本案經「兩省大憲飭委大員會同查議」，參與辦案的有河陝汝道、潼商道、陝州與同州府，勞師動眾之處不言而喻。必須指出的是，「隨地食鹽」的政策不僅在閩鄉未能落實，鄰近潼關的華陰、郃陽各屯，在乾隆初年也都是食用潼鹽的。反而是在靈寶、大荔等屯地較少的州縣，長久以來皆勵行「隨地食鹽」的政策。靈寶與閩鄉同樣隸屬於河南陝州，靈寶額鹽每觔一分，比閩鄉鹽價更貴了一釐，但靈寶屯丁卻能遵照規定，食用較貴的靈寶額鹽，¹⁰³ 這與境內屯丁人數較少，與潼關距離也較遠，自不無關係。然而，即使在潼關衛撤廢之後，原本同屬潼關衛的屯地在閩鄉、靈寶出現「一州兩制」的狀況，造成管理上的困擾，不能不說是拜明朝「犬牙相制」政策之賜，也是當初設定「犬牙相制」政策時始料未及的後遺症。

潼關屯地在閩鄉縣內所佔的比重究竟有多高，借用閩鄉縣主政者的說法，似乎是屯多於民的。乾隆十三年刊行的《閩鄉縣志》卷首，〈圖考〉，梁溥，〈城池山川圖說〉謂：¹⁰⁴

閩邑居豫之西偏，與潼華接壤，山川封域，固不相侵涉。乃按其戶籍，閩民僅十六里耳，潼軍戶之散寄於四境內者凡二十有二屯。此二十二屯，踐閩之土，食閩之毛，而隸潼之籍，閩之約束既莫遵，潼之耳目又不及，往往徼倖於上之掣肘，而絕無顧忌，邑之民甚病之。……閩之境內皆王土也，豈謂其不可寄，然以客戶而梗化難治，亦非王臣之義所宜有也。何以使之隸籍於潼而受治於閩乎？宰斯土者，不得不講求所以善全之術矣。

梁溥任閩鄉縣令在乾隆初。¹⁰⁵ 根據縣志的記載，閩鄉縣舊分二十五里，後裁為二十二里。天啓五年（1625）裁為二十一里，順治三年再併為十六里。相較於閩鄉縣的人口一再萎縮，境內的潼關衛屯地卻不動如山，二十二屯軍戶隸籍於潼

¹⁰² 張任自乾隆四年任河東運使，至八年改郭一裕繼任；參見《河東鹽法備覽·官職門·運使》卷三，頁31b。

¹⁰³ 以上參見光緒《閩鄉縣志·田賦·鹽法》卷四，頁13b-21b，〈知縣祖廷梁查議鹽價詳文〉、〈本道憲張咨潼軍隨地食鹽議〉、〈潼軍改食閩鹽咨文錄〉。

¹⁰⁴ 又見光緒《閩鄉縣志·圖考說》卷首，頁12b-13a。

¹⁰⁵ 據周慶增等纂修，劉坦等編，乾隆《閩鄉縣志》（十二卷，首一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刊本），〈序〉，梁溥任閩鄉知縣始於乾隆十一年（丙寅），志修成於乾隆十二年。又見光緒《陝州直隸州志·職官》卷五，頁32b。

關，完全不受閩鄉約束。乾隆《閩鄉縣志·圖考》卷首，錄有〈城池山川全圖〉（圖三），圖中標示了十六里、¹⁰⁶ 二十二屯的相對位置，凸顯出屯民雜處問題的嚴重，也隱約透露出時人的不滿情緒。後出的光緒《閩鄉縣志·圖考》卷首，亦刊有〈屯里圖〉（圖四），乍看與乾隆志所繪情況相同，但從其後另按各路繪製的〈村里分圖〉，不難瞭解屯營在村里環伺下，其比重並不如單純的屯里圖所示那般突出。以「正南路附西南路」（圖五）為例，屯里圖在路家屯、上董屯、孔家屯、高柏屯、張村屯、土橋屯與上陽屯所圍成的區塊之間，只標示了郭村里、寨里原、坊廓里、營田里、官庄里、富原里數處；但對照村里分圖，後者呈現的毋寧是密集的鄉村間夾雜著若干屯營。當然，光緒間的村落發展與乾隆間的狀況必有落差，但一里之內不止一村也是不爭的事實；何況小的屯營可能只有軍戶十戶左右，¹⁰⁷ 規模實不可與里相比。而潼關衛軍屯到了清末，顯然已經不再是對立的象徵，¹⁰⁸ 屯、里的區分僅只是歷史留下的一點記憶，都是閩鄉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閩鄉縣在順治十六年裁併弘農衛後又增加洪農一里，加上入清後將閩鄉東鄙原屬陝州治者改隸閩鄉，另立東呂里，總數增加到十八里。洪農里本弘農衛所屯田，順治十六年裁衛後其丁地事務歸併河南府屬陝州、靈寶、閩鄉、澠池、盧氏、永寧、宜陽各州縣管理。¹⁰⁹ 閩鄉縣境內的洪農里有大字營、霽霽營、南

¹⁰⁶ 據乾隆《閩鄉縣志·建置·里保》卷二，頁20a-21a，順治以後閩鄉縣由十六里陸續增加至二十四里，但該圖只揭載了包括洪農里在內的十七里。其中洪農里係由原弘農衛屯田改設，故不列入十六里之內。

¹⁰⁷ 沒有資料直接說明屯營的大小，各屯營的大小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以華州為例，境內潼關衛屯營僅只一處，據吳炳道修，劉域纂，光緒《三續華州志》（十二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序刊本）卷一，頁27a，〈田賦〉：「華州接收潼關屯地：原額共地九頃二十三畝四分四釐」，以軍田一分額地百畝計，不過十分地，理論上屬於十戶左右的軍戶。另外，渭南縣境內也只有一个潼關衛屯營，道光《重輯渭南縣志·賦稅考》卷八，頁3b，記有「潼關衛屯地」六十三頃零，則該屯營至少有軍戶六十餘戶。

¹⁰⁸ 黃覺等修，韓嘉會等纂，民國《閩鄉縣志》（二四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119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影印，1968〕），卷一四，頁3b，〈宦績傳〉，於「趙民獻」條下記載「按：天下治平日久，迄今軍人服田力穡，入學筮仕，已與居民同化，無復強悍之習」，充分說明清末民初時，衛屯、屯民已不足為懼。

¹⁰⁹ 參見鄒守愚修，李濂纂，嘉靖《河南通志》（四五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微膠片，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攝製），卷一三，頁31b-32b，〈兵禦〉；賈漢復修，沈荃編纂，順治《河南通志》（五〇卷，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刊本），卷八，頁19b，〈兵禦〉；光緒《陝州直隸州志·職官·武職》卷五，頁20b。

營、北營等四營，歸併後其錢糧徵收與閩鄉諸里同樣，設「鄉總」完納。而潼關衛屯堡在閩鄉縣境者共二十二屯，間有衛軍買種民田寄庄於閩鄉者，¹¹⁰ 這時便也成為閩鄉縣歸併的對象。嘉慶《續潼關縣志》卷中，〈職官·名宦·補遺〉記湯斌事蹟：

潼關介秦豫之交，民有種鄰壤田者，仍服本省役。豫民恃斌為鄉人，欲使秦民充豫省徭役，斌嚴斥之，悉令如舊。

湯斌係河南睢州人，故豫人視其為鄉人。其先世初以軍功為金川門世襲百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故湯斌實為睢陽衛官籍出身。順治六年成進士，十三年二月授整飭潼關兵備、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十五年十一月陞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分守嶺北道。¹¹¹ 豫民「欲使秦民充豫省徭役」，即發生在其潼關兵備道任內。《湯斌集·湯子遺書》卷七，〈陝西潼關副憲公移·曉諭事〉記其事：

竊照國家畫土分疆，自有定制，非奉明旨，誰敢擅自紛更？潼關、閩鄉雖壤地相錯，實隸屬兩省，分里編甲，數百年來從無異議。豈至今日遂能奪此益彼，變亂成章？今聞閩鄉指稱奉文定里，差役拿人，借端索賄，驚懼子弟，憂患長老，殊甚詫異。當今國課急迫，種地納糧，自難刻緩。至於割裂疆界，另定里甲，必兩省各臺會議具題，始可帖服軍民之心，安有本道絕不與聞，而擅拿潼民編入閩籍之理？為此，示仰該衛軍民人等知悉：凡有寄庄閩鄉者，當應時辦納錢糧。若怠玩愒期，聽該縣提催，不得藉口異界，以茲規避。至於擅定關東里名色以亂版籍，及晝夜打詐恐嚇愚民者，本道斷難坐視，各宜安靜，勿自驚擾。

當時正值弘農衛撤衛改里之議進行的如火如荼；潼關衛的去留也在議題之中（詳下節）。河南一方在完全未知會潼關道的情況下，「擅定關東里名色」，強行派遣差役追拿潼民寄庄閩鄉者，引起湯斌的反彈。所謂「寄庄」，又稱為「附籍」，凡潼關民買種閩鄉田，輸納閩鄉賦稅，仍服潼關徭役者，謂之「寄庄」。¹¹² 而

¹¹⁰ 據民國《閩鄉縣志·田賦》卷八，頁2b，閩鄉縣有「寄糧，係姚、馮、盛、盧四大戶以潼籍買種閩地，不行雜差」。

¹¹¹ 參見《湯斌集》下冊，頁1761-1766，〈湯斌研究資料·年譜定本〉；頁1791，〈墓志銘〉。湯斌任潼關兵備在順治十三至十五年間；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九八，頁765-2，順治十三年二月丙子；卷一二一，頁942-2，順治十五年十一月辛酉。

¹¹² 參見于志嘉，〈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頁80-104。

潼、閩兩地軍民錯處，其間固有衛軍買種民田者，亦不乏閩民租種軍田者。湯斌堅決反對寄庄潼軍改歸閩鄉管轄，顯示湯斌在處理潼關、閩鄉兩地寄庄民人徭役爭議時，是更能站在衛人的立場，為潼關衛民爭取權益的。

順治十五年末，湯斌離任。不久，弘農衛即正式裁撤，改設洪農里。潼關廢衛雖要推遲到雍正二年才得實現，但隨著弘農廢衛，河南一方益發官民同心，欲以寄庄潼軍另立關東里。順治十八年，潼軍、閩民之間鬧出盜案：¹¹³

順治十八年，閩豪聚眾盜掠潼民亢廷相、余自錫家。事發，伊以催糧抵賴。查其人并無欠糧，復以攀差捏誣。蒙上憲審直擬罪，復欲將潼民立關東一里，由閩管理。蒙按院批潼關道查詳，詳云：潼關與閩鄉，地則接壤，界屬兩省，軍民錯處，有衛軍買種民田者，亦有閩民租種軍田者，皆名曰寄庄糧，祇遵由單完納正賦，由來久矣。今閩民借端橫索，聚眾打搶，互相控聳，曾經兩省會審擬罪。茲閩鄉縣稱奉豫憲，另立關東一里，勢必軍為催頭，以應縣役，潼關軍差，誰為代之。一身應兩地之役，勢必不能。況異鄉之人，越境當差，揆之情理，亦覺難堪。豈閩民有種軍地者，亦肯赴關當差乎。呈請憲臺咨豫，停其分割，仍照舊制，移會准行，飭令該衛准此，出示曉諭士庶人等。但有寄庄閩鄉民田者，仍祇納正糧，毋得錯違未便云云。立石存案。

這一年，閩鄉豪強聚眾盜掠潼關軍戶。事發之後，先是偽稱潼民欠糧，繼而復以差役誣攀。實則被誣攀的都是寄庄潼民，原本即無差役負擔，又無欠糧記錄。案經河、陝兩省會審，查無實據，還潼民清白；並刻石立碑，使得所有寄庄閩鄉之潼民，仍只需向閩鄉縣繳納正糧，役則仍歸潼關，閩民不得誣攀。理由在於：潼、閩二地皆有寄庄，皆只需完納正賦；今若將潼關寄庄之田另立關東里，勢必以軍為催頭，以軍應閩鄉縣役。其結果潼軍必須同時充應閩鄉縣役與潼關軍差，而閩民種軍地者卻不必赴關當軍差，非但不合情理，於勢亦必不能。

以寄庄潼民歸併閩鄉之議至此終於獲得消解。然而，潼、閩軍民錯處，軍強民弱，導致雙方爭訟不止，也是不爭的事實。嘉慶《續潼關縣志》卷上，〈田賦〉：

潼屯東界閩鄉，西界華陰，壤地相錯，居民逼處，是以爭訟滋煩，經理匪易。

¹¹³ 參見《潼關碑石·閩民妄攀行差碑》，頁227；又見嘉慶《續潼關縣志·藝文志》卷下，頁25b-26a。

即指出潼關衛因與鄰近州縣犬牙相錯，軍民逼處，訟多難治。另一方面，衛官貪暴，聽訟不法，也是一大亂源。萬曆四十年前後出任潼關兵備道的文球曾下令「訟歸有司」；¹¹⁴ 萬曆四十七年更分西安撫民同知駐潼關，撫治軍民，¹¹⁵ 首任撫民同知韓霖「聽訟果決，吏治稱善」。¹¹⁶ 然而，從崇禎十五年到任的署潼關兵備道喬遷高，仍只能藉使「獄訟盡歸有司」來「嚴整憲紀」，¹¹⁷ 不難瞭解衛弁橫暴、干預司法的問題很難根治。入清以後，除仍舊不許衛弁司刑名外，對於這類壤地犬牙相錯的衛所屯地，則推行保甲法，由附近州縣一體稽察。《湯斌集·湯子遺書》卷七，〈陝西潼關副憲公移·申嚴保甲之法使民自為捍禦以安民生以靖地方事〉列舉保甲施行辦法十一條，第十條即云：

各州縣衛所有壤地犬牙相錯者，應聽附近州縣一體譏察操練。若借口異籍岐界，規避掣肘，及救護不前者，申解本道，以阻撓論罪。

湯斌於赴任伊始即申嚴保甲法，¹¹⁸ 實施對象不限於一般百姓，亦包括潼關營軍丁以及潼關衛屯軍戶。在州縣衛所壤地犬牙相錯的地方，衛屯軍戶應聽附近州縣一體稽察，雙方需協力防守。然雖一再嚴申：「自今以後，本道專以保甲之舉否，定有司之殿最」，¹¹⁹ 據同書〈軍民異籍約束難聯預鳴專飭以便協力防守事〉：

據同州申，據此，為照各州縣衛所有壤地犬牙相錯者，應聽附近州縣一體

¹¹⁴ 參見註94。衛官問理詞訟的實例見《潼關碑石·孫中川墓志銘》，頁106：「（嘉靖辛丑年）五月到任，兵憲周潭汪公見其青年謹慎，每以詞狀批委問理，即能剖決不滯」。孫中川即孫垣，嘉靖間世襲潼關衛指揮使。又一例見王祖嫡，《師竹堂集》（三七卷，目錄二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天啟刻本影印，1997〕），卷二一，頁15a-18a，〈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鄧野孫公暨配孺人趙氏合葬墓誌銘〉，記載孫一誠於嘉靖間「應例授潼關衛署指揮僉事，歷管軍政，士卒悅服，賢聲冠諸將。訟不決者，多委公理」。本來衛所管軍官中的鎮撫司官就是負責審理軍官、軍人詞訟的，軍民相涉的戶婚田土等民事案件亦需由管軍衛門約會有司官員一體審問；參見于志嘉，〈從《薈辭》看明末直隸晉交界地區的衛所軍戶與軍民詞訟〉，頁778-785。文球下令「訟歸有司」，其間轉變，值得探究。

¹¹⁵ 乾隆《同州府志·職官志》卷一九，頁3b-4a。

¹¹⁶ 參見康熙《潼關縣志·職官·撫廳》卷中，頁7a。

¹¹⁷ 參見康熙《潼關縣志·藝文·監軍喬公傳》卷下，頁48b-49b。

¹¹⁸ 參見《湯斌集》上冊，頁399-400，〈湯子遺書·陝西潼關副憲公移·盜賊橫行捕務日弛急圖振勵期觀盜息民安之效事〉；頁434-435，〈再行嚴飭防禦以靖地方事〉。

¹¹⁹ 參見《湯斌集》上冊，頁388-389，〈湯子遺書·陝西潼關副憲公移·再嚴保甲之法以安民生以靖地方事〉。

譏察，協力防守。此本道下車時，于申嚴保甲之法牌中已詳言之矣。何潼民悍然不遵也？……為此，仰廳官吏查照來文內事理，一面嚴行潼關衛，申飭各屯軍戶，坐落某州縣境內，應聽某州縣一體譏察，協力協禦。仍行各州縣，凡衛屯坐落該州縣境內者，勿分州縣、衛籍，一體約束。若敢借口隔屬，規避掣肘，不服稽察，失事不互相救者，即據實申報本道，以憑拿究懲處。如該州縣借口軍屯推諉，漫不查考，使奸宄潛迹，貽害地方者，事發一併揭報題參。

則不僅地方官配合度低，潼民亦悍然不遵，效果十分有限。¹²⁰

五・從潼關衛到潼關廳

潼關在明末清初之際因先後遭逢大順軍與清軍的摧殘，人口急遽減少。¹²¹及「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徵調往還者旁午，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¹²²順治十三年，湯斌「初至潼關，城中居民不滿三百家。再閱歲，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¹²³

湯斌在潼關兵備副使任內，也曾奉命就潼關衛歸併一事做過評估。《湯斌集·湯子遺書》卷七，〈陝西潼關副憲公移·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併衛所丁田歸之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事〉：

據西安府呈詳，看得潼關一衛設有專城，界連晉豫，為三省之咽喉，實全秦之門戶。且屯田分隸兩省，地方最為遼闊；又路處首衝，過往兵馬輪蹄

¹²⁰ 本文第五節引《湯斌集·湯斌研究資料·年譜定本》，指出潼關衛在順治十三年湯斌赴任之初，城中居民尚不滿三百家，兩年後流民歸附者竟達數千戶。其後文如下：「或問公何以為政？公曰：吾惟於保甲、鄉約、義學、社倉四者加之意而已」；見《湯斌集》下冊，頁1765。顯然湯斌推行保甲法在潼關城內有揭竿見影的效果，但在潼關衛屯分佈的廣大地區，礙於過去州縣與衛屯間多處於衝突矛盾的關係，湯斌欲以州縣譏察衛屯軍戶的作法並不易實現。

¹²¹ 《湯斌集·湯子遺書·陝西潼關副憲公移·請修關城以重岩疆事》，謂潼關「自閩逆蹂躪，人民屠戮殆盡，廬舍灰燼無餘」；見《湯斌集》上冊，頁321-322。其事見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頁204-205。閩軍之外，順治元年十二月底到次年初清軍與閩軍在潼關對決，也造成死傷無數；參見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139-143。

¹²² 參見《湯斌集》下冊，頁1792，〈湯斌研究資料·墓志銘〉。

¹²³ 參見《湯斌集》下冊，頁1765，〈湯斌研究資料·年譜定本〉。

交錯，騶糗車牛供應繁苦。況昔年設衛建學，文教武備，以屏捍川陝，而左右州縣皆相去遙遠，未敢遽議歸併，似當仍舊為便也。

結果是因為西安府反對，逃過這一波的裁衛風潮。¹²⁴

潼關衛雖有屬於自己的城，但畢竟不是實土衛所，¹²⁵ 因此在雍正二年裁撤潼關衛時，原本是比照其他非實土衛所裁撤的情形，將所屬屯地歸併所在各州縣分別管轄；潼關應支兵糧則就近改撥，令潼商道收支。¹²⁶ 然而，廢衛不久就因為在潼關增設駐防滿兵，¹²⁷ 有兵餉糧草之需，為使原潼關衛屯糧能如期徵收，有效利用，¹²⁸ 雍正五年，因川陝總督岳鍾琪之請設置了潼關縣，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復設教諭、訓導各一員。¹²⁹

新設立的潼關縣隸屬於華州直隸州，領有原潼關衛屯地，因此也無所謂「四至」、「廣袤」可言。¹³⁰ 雍正十三年，陞陝西同州直隸州為同州府，將華州直隸州與所屬之華陰、蒲城、潼關三縣俱歸同州府管轄。¹³¹ 乾隆四年，裁潼關驛驛丞，歸知縣管理。又裁潼關縣永樂鎮巡檢，裁汰弓兵十五名，仍留十五名；船隻水手就近歸風陵司巡檢兼管，移風陵司巡檢駐潼關縣城。¹³² 十二年，奏准

¹²⁴ 此篇名實不符，似有殘缺。茲引全文如上，以備後日進一步查考。

¹²⁵ 譚其驤指出：「洪武初或罷廢邊境州縣，即以州縣之任責諸都司衛所；後復循此例，置都司衛所於未嘗設州縣之地；於是此種都司衛所遂兼理軍民政，而成為地方區劃矣。《明史·地理志》稱此種衛所為實土衛所，附見於各布政司下」；見〈釋明代都司衛所制度〉，《禹貢半月刊》3.10 (1935)：2。註39所謂「邊衛無州縣可歸」者，殆屬此類。又見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制度與軍管型政區〉，《軍事歷史研究》2004.4：83-85。顧誠雖未使用實土一詞，但也指出明代都司衛所管轄土地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在不設布政司的地方由都司、行都司管轄相當於內地一省的土地；第二種是都司和布政司同駐省會，而都司下屬的衛所管轄著相當於府、州、縣範圍的土地」，這兩種情況都可稱為實土衛所；見〈明前期耕地數新探〉，《中國社會科學》1986.4：202。

¹²⁶ 參見《清世宗實錄》卷二六，頁403-2，雍正二年十一月壬子。

¹²⁷ 參見《清世宗實錄》卷四二，頁618-2~619-1，雍正四年三月己亥。

¹²⁸ 據雍正《陝西通志·建置》卷三，頁17a，「（雍正）五年，以輸納不便，照甘省改衛為縣之例，設縣專理」。

¹²⁹ 按：《清世宗實錄》卷五四，頁813-1，雍正五年三月戊子朔云：「改陝西潼關衛為潼關縣」；實則由廢衛到置縣，中間有三年的緩衝。

¹³⁰ 乾隆《同州府志·地理志·疆域》卷二，頁18b，謂：潼關廳「治內境土皆屯衛舊區，錯處華陰、朝邑及河南靈、閿諸邑，分布參差，難以廣袤道里計。今第就建治一區，列其近界」。潼關縣亦然。

¹³¹ 參見《清世宗實錄》卷一五四，頁890-1，雍正十三年四月戊午。

¹³²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九九，頁505-2，乾隆四年八月癸卯。

裁同州府潼關縣缺，其屯地錢糧等事歸駐劄之同州府撫民同知管轄；同時改潼關縣學爲廳學，仍留訓導一員；原設之典史、教諭、大慶關巡檢俱裁。¹³³

潼關裁縣後，「潼城戶口同近關之閿鄉屯戶，遇有命盜一切戶婚田土等項，驛遞、夫馬、兵糧、常社，以及盜逃、賭博、私宰、燒鍋、硝磺、打降、遞解餉犯等事，悉歸撫民同知分別承辦」。原定爲衝繁二項缺的潼關撫民同知，因之改爲衝繁難三項要缺。¹³⁴

潼關縣正式裁撤在乾隆十三年，據《清高宗實錄》卷三一八，乾隆十三年七月丁亥：

戶部等部議覆陝西巡撫陳宏謀疏稱：裁汰潼關縣一案，准部覆：各項另議具題。一、潼關縣屯地并節年開墾地共三千三十五頃二十五畝一分零，共徵本色糧一萬四千四百三十四石九斗五升零、折色銀二千二百二十四兩一錢零。內坐落潼、華、閿屯地應歸潼關廳徵。坐落河南靈寶縣屯地歸靈寶縣徵。坐落大荔、朝邑、郃陽、澄城、華州、臨潼、渭南屯地歸大荔等七州縣徵收。一、潼關縣額徵屯地錢糧，照例一石折銀一兩。靈寶等八州縣耗銀，請照加一五徵收。至靈寶隨徵耗銀，聽豫省酌議。一、潼、華、閿屯戶所有巡查地方、編挑保甲等事，應隸潼關廳經理。坐落華州等八州縣屯，應改隸八州縣經理。一、潼關廳供潼關營兵馬糧料，在潼關廳額徵銀內動支，給官兵自行採買。一、潼關縣倉貯兵糧及常平社倉，均歸潼關廳經理，潼商道盤察監放。其坐落大荔縣社倉，改歸大荔縣經理。一、大慶關巡檢原管事務，應併歸朝邑縣經理。一、潼關廳養廉請准於應得八百兩之外，添支公費銀二百兩。一、潼關縣額銷鹽引，照例辦理。應解當稅銀二十兩，內坐落大荔縣當舖，隸大荔縣徵解；關城當舖牙稅，歸該廳徵解。田房稅銀，潼、華、閿俱歸該廳徵解，靈寶等各屯地歸各州縣徵解。一、華屯生童合潼城、閿鄉存留廳學，進額九名；大荔撥二名，朝邑撥一名。一、潼關縣原設廩增二十名，應各減去五名，以符廳學十五名之制。一、潼關裁汰典史衙署，改作把總公廨。俱應如所請。從之。

潼關廢縣改廳的原因，應與潼關縣屬地太過分散、管理不易脫不了干係。改廳之

¹³³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二八六，頁727-2~728-1，乾隆十二年三月乙未。

¹³⁴ 參見《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編號051993，乾隆十二年五月六日，陝西巡撫徐杞，〈為遵旨議奏事〉。

後，轄區大幅度縮減，僅保留位在潼關、華陰、閿鄉三地的四十二屯，¹³⁵ 額糧五千餘石歸潼關廳徵收，「仍徵本色」，免徵耗糧；¹³⁶ 其餘分散在河南靈寶縣及陝西大荔、朝邑、邵陽、澄城、華州、臨潼、渭南的屯地，則併入各該州縣，「俱改征折色」，由各該州縣徵收，額糧耗銀照加一五徵。另靈寶隨徵耗銀聽豫省酌議。所有屯戶與民戶一體，需負擔巡查地方、編挑保甲等事，其中潼、華、閿三地屯戶應隸潼關廳經理，坐落華州等八州縣屯戶則改隸八州縣經理。應解「田房稅銀」，亦除潼、華、閿三地俱歸該廳徵解外，靈寶等各屯地歸各州縣徵解。另「當稅銀」二十兩，則以坐落大荔縣當鋪隸大荔縣徵解；坐落關城當鋪牙稅歸潼關廳徵解。¹³⁷

潼關降為廳以後，儘管所屬屯地已較前大幅縮小，但仍跨河、陝兩界。其中閿鄉境內之屯戶，不但產業與閿民互相典賣，遇有命盜干連及戶婚田土事件，雖人犯近在咫尺，但礙於主管單位不同，閿鄉縣不能拘提，必須申請潼關廳押發。甚有刁黠之徒，懼怕被潼關拘提，反到潼關飾詞誣告，致原告民人反遭潼關拘提，自己則藏匿他處，以致案難速結。為恐奸匪藉機逃竄其間，難以稽查，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經河南巡撫葉存仁提案，翌月定議：將閿鄉屯戶改歸閿鄉，「一體編入保甲；應徵兵糧草束悉照靈寶縣之例，每糧一石折銀一兩，每草一束折銀一分，解交豫省司庫，撥充兵餉」。「一切大小詞訟案件，以及屯戶應納寄庄民糧、編排保甲等事，悉歸閿邑辦理」。¹³⁸

閿鄉境內屯地、屯戶改歸閿鄉管轄，除食鹽已於乾隆七年議定閿鄉潼民就地買食閿鹽，無庸另議外，另一項令人矚目的是有關學額分配的問題。潼關衛學設於正統四年，康熙《潼關縣志》卷下，〈藝文〉，呂枏，〈潼關縣〔衛〕嘉靖三年重修學記〉：¹³⁹

¹³⁵ 參見嘉慶《續潼關縣志·建置志·編屯》卷上，頁10b-12a。

¹³⁶ 戶部議覆陳宏謀疏中，僅提到「潼關縣額徵屯地錢糧，照例一石折銀一兩」；但據喬光烈，《最樂堂文集》（六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影印，1997〕），卷二，頁27a-28b，〈裁潼關廳耗糧議〉，潼關縣額糧一萬四千餘石中，屬於閿、華、潼三處的五千餘石是仍徵本色的，分隸他縣的才「俱改征折色」。

¹³⁷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三一八，頁222-2~223-1，乾隆十三年七月丁亥。

¹³⁸ 參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9輯，頁717-719，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撫葉存仁，〈奏為豫陝兩省田賦版籍宜歸畫一辦理摺〉；《內閣大庫檔案》編號022329，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戶部為奏河南陝西二省屯地由〉。

¹³⁹ 此碑記雖題為「嘉靖三年重修學記」，據碑文，重修始於嘉靖壬午（元年），落成於癸未（二年）。

潼關縣〔衛〕學屬陝西，而衛則直隸兵部。蓋陝西之東境而河南之西塞也。

同卷，唐咨伯，〈義學公田記略〉：

潼關故屬衛地，……潼之庠隸在華陰。

可知衛學地在華陰，屬陝西提學官管轄。¹⁴⁰《湯斌集·湯子遺書》卷七，〈陝西潼關副憲公移·教職遠任艱難乞賜酌議申請就近推選以免曠職事〉：

據西安府呈：看得教職一官，奉旨專用本省人選授，不但人地相習，且寒官免跋涉道路之艱，措辦盤費之苦，法誠至善。獨潼關衛昔屬直隸管轄，故儒學教職，悉以外省銓授。自我朝定鼎，衛改屬西安府，而教官仍照舊例除授。每每遠隔幾省，計程數千餘里，寒官望而卻步。即或間關遠來，行□既空，稱貸無門，近如教授辛調羹竟飄然長往。……合無呈請具題，以後潼關衛教職照依本省之例，就近銓補，庶朝聞命而夕受事，學政、士習皆有賴矣。

可知明代學官雖自隆慶五年（1571）以後得選除本省隔府地方，¹⁴¹ 潼關衛學卻因衛屬直隸，衛學教職「悉以外省銓授」。¹⁴² 入清以後，有旨學官專用本省人選

¹⁴⁰ 據蔡嘉麟，《明代的衛學教育》（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2），明代衛學以衛指揮等官為提調官，隆慶二年以後，針對直隸各衛儒學，開始委派文職官分擔衛官的提調職責。原衛官提調職責中，有關「季考生員及考選童生，聽各該巡按御史，定委通判等項文職官管理」。提學官則始設於正統元年，天順六年以後成定制，各省設按察司官（副使或僉事）一員，南北直隸設監察御史各一員，專一提調學校。提學官對衛學事務的監督管理，與管理府州縣學相同。但因衛學多在邊區，提學巡歷不易周及，有分設提學官或令他官代理的因應辦法。如宣府鎮衛學皆由直隸提學御史管理，但因地里遼闊，隆慶三年以後獲准以巡按宣大監察御史帶管；見頁119-128。康熙《潼關縣志·藝文》卷下，頁31a-32b，王維楨，〈潼關縣〔衛〕修學記〉，謂潼關衛學之建置「主在兵司」，嘉靖二十一年實際負起修復責任的，是潼關兵備副使周相；周相丁憂後，繼任的汪尚竄承其志而終其事，顯示嘉靖年間的潼關衛學是在潼關兵備副使的監督下。或因此而有「學屬陝西」之說。

¹⁴¹ 按：《明史·選舉三·任官》卷七一，頁1716：「洪武間，定南北更調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後官制漸定，自學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唯學官「得官本省」應始於隆慶五年，《吏部職掌·文選清吏司·求賢科·選用教職》卷三，頁45b，隆慶五年大學士高題准：「學官司教，非有民社之寄，而又官小家貧，不便遠方。今後通得選除本省隔府地方」。又見《明穆宗實錄》卷五九，頁9a，隆慶五年七月丙戌。

¹⁴² 查康熙《潼關縣志·職官·教職》卷中，頁12a，明代潼關衛學教授籍貫多不傳，留下姓名的有十三位，僅崇禎末年擔任衛學教授的許嗣復一人載明為北直人。又見同書卷中，頁3a，〈職官·名宦〉；卷下，頁49b-50b，〈藝文·教授許公傳〉。

授，潼關衛隸屬於西安府，本應由陝西人中選授，卻照舊例由直隸除授，以致寒官畏避路遠，有棄官不就者。這也是「犬牙相制」之制禍延後世的又一例證。

潼關衛學教官經湯斌呈請，此後改由陝西人中選授。¹⁴³ 另一方面，衛學生童來自於衛屯所在地，雍正二年撤衛後，原潼關衛學併入華陰縣學，原華陰縣學由中學改為府學規模，名額由十二名增至二十名。雍正五年設潼關縣，華陰縣學仍舊改回中學舊額，新設潼關縣學照該衛原額取進十二名，廩、增各二十名，二年一貢；復設教諭、訓導各一員。及乾隆十三年裁縣設廳，除將潼關縣學原設廩、增二十名各減去五名，三年一貢，以符廳學之制外；原潼關學額十二名亦被縮減為九名，由華陰、潼關、閿鄉三地屯民取進。所餘三名，分撥給大荔二名、朝邑一名。裁教諭，只設訓導一員。乾隆二十八年將閿鄉屯民改歸閿鄉管轄，總計三千餘戶的閿鄉縣屯戶改在閿鄉縣入籍應試，潼關廳學額再撥出二名給閿鄉縣學，總數只剩下七名。¹⁴⁴

乾隆二十九年以後的潼關廳，屬地更縮小到潼關、華陰兩縣境內的屯地。長久以來與閿鄉縣的瓜葛一旦釐清，繼之而來的是與華陰縣民間的紛擾。《潼關碑石》，〈華民妄攀行差碑〉記載：¹⁴⁵

乾隆三十一年，華民妄攀行差，合衛士庶具控。道憲屠批云：軍人寄庄，不隨寄籍行差，定案已百年之久，不便驟為更易等語。又呈同州府林批：候移潼關廳查明舊卷妥議奪。隨蒙潼關廳移文內稱：查潼關自明季以來，原屬衛治，百姓悉屬軍籍，散處各州縣，民地犬牙相錯。軍人置買民地，民人置買軍地，自昔然也。至於輸納糧項，承辦差役，軍不雜民，民不雜軍。順治十四年有卷可查。雍正年裁衛改縣，仍復如初。乾隆年裁縣歸廳，悉遵舊制。現在華民種軍田者，亦係一體完納，并不聞潼民拉扯華民

¹⁴³ 嘉慶《續潼關縣志·職官》卷中，頁6b-7a，記有雍正二年裁撤衛學前的幾位教授，其籍貫分別是：王晨—華陰人、屈愈謙—華陰人、王廷璫—華州人，出身地都緊鄰潼關。頁7a記教諭三人，分別是秦大觀—三原人，雍正十年任；蔡任一宜君人，雍正十三年任；劉竹勳—蘭州人，乾隆二年任，三人俱為陝西人。

¹⁴⁴ 以上參見素爾訥等撰，《欽定學政全書》（八〇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刻本影印，1997），卷五六，頁10a-b，〈陝甘學額〉；卷六八，頁12a-b，〈衛學事例〉；《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9輯，頁717-719，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撫葉存仁，〈奏為豫陝兩省田賦版籍宜歸畫一辦理摺〉；《內閣大庫檔案》編號022329，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戶部為奏河南陝西二省屯地由〉。

¹⁴⁵ 參見《潼關碑石》，頁230-231；又見嘉慶《續潼關縣志·藝文》卷下，頁26a-27a。

種軍田者，於正賦之外復令行差，何獨軍民種民田者不能邀免耶？再，乾隆三十三年大兵進剿金川，軍臺大差亦係軍民各辦，寄庄不與，有卷可查。再，潼自改隸後，三分去其二，既欲於本籍徵賦、麥、豆、草，支供潼營兵餉；復令於寄庄民田為再辦差務，無論一身而應兩役，辦理有所不支，即揆之情理，亦屬偏苦。敝廳以公辦公斷，不敢存畛域之見，惟體上憲軫念窮黎，軍民一體至意，相應仍遵舊制，各行各差，實為妥洽。申覆同州府、潼關道批：仍遵舊制，不行寄庄差役，刊示曉諭軍民悉知，永遠遵守。立石存案。

整體看來，不過是將昔日潼、閩之間的爭議複製了一遍，因此要作裁斷並非難事。本案經同州府、潼關道一致決議：「仍遵舊制」，免去寄庄潼民正賦以外的差役。

六・結論

譚其驤曾經指出：「封建王朝劃分行政區劃，只考慮如何有利於當時的封建統治，而是否有利於地方建設和經濟發展，根本不在考慮之列」；而明朝許多不符合自然、經濟和文化區域的區劃，都是「把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頂峰的明太祖朱元璋搞出來的」。¹⁴⁶ 譚其驤的這段談話，雖不及於軍事區劃，但也完全適用於軍事區劃。特別是本文討論的以軍事區劃與行政區劃「犬牙相制」的概念，緣起於朱元璋，貫徹於朱棣，最能凸顯君主專制的特性。就中又以潼關衛所代表的若干直隸衛所，由於轄區遠離直隸地區，先天具備管理困難的問題，情況最為複雜。這些直隸衛所的配置，乃是以君主專制為出發點，以支援中央、箝制地方為目的，不料最終卻因為中央統治力量的衰弱，不但不能發揮應有的功效，反而必須仰賴地方，藉地方之力始能正常運作，可以說極大程度的見證了明代君主專制政權由盛而衰的過程。

「犬牙相制」的現象還體現在衛所軍屯與州縣民地的交錯上。以潼關衛為例，明代潼關衛七十二屯分散在二州七縣，各州縣內部均呈現軍屯與民地犬牙相錯的局面。軍民雜處、軍強民弱的結果，屯軍不當侵蝕地方資源的情形屢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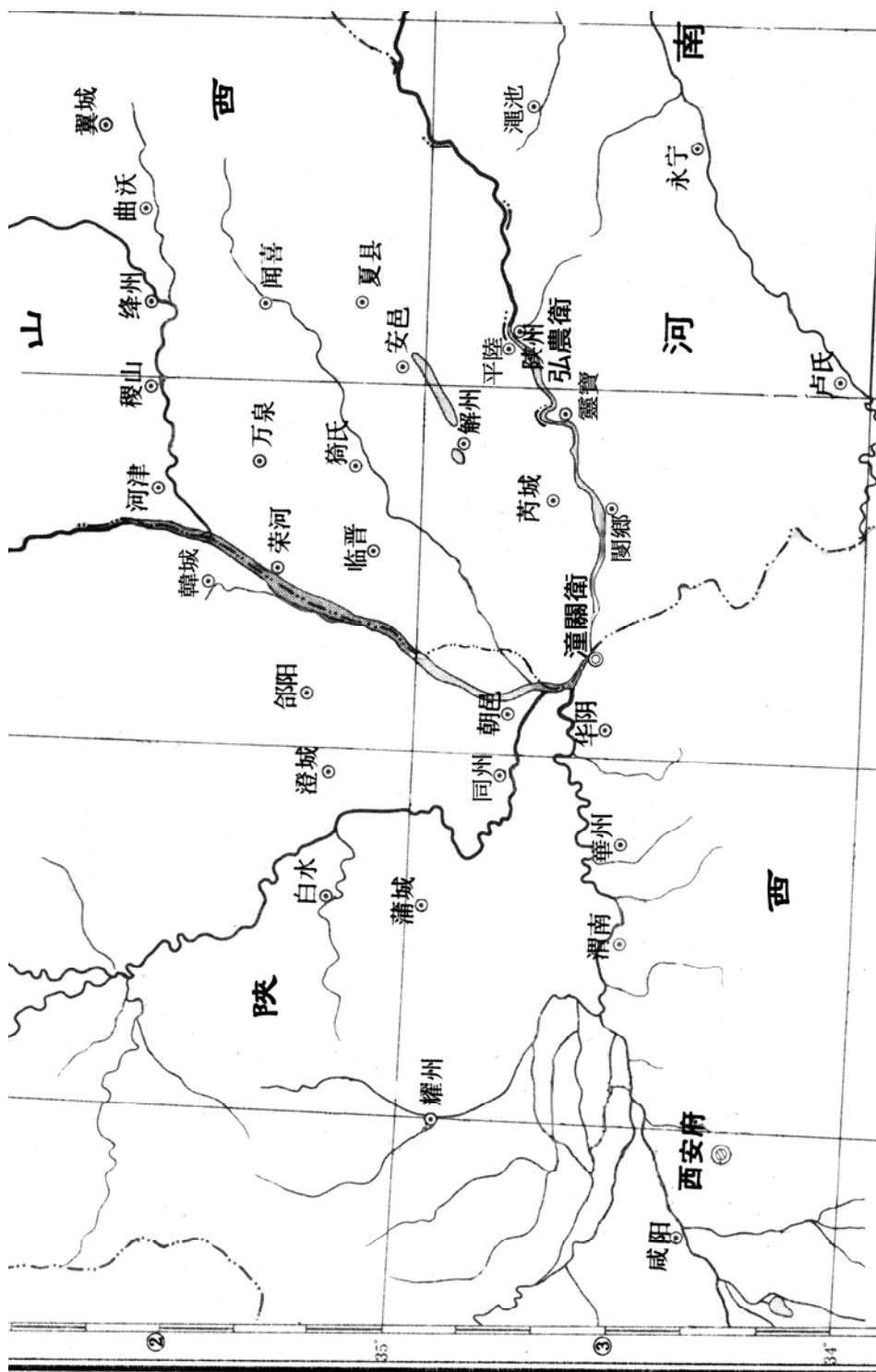
¹⁴⁶ 譚其驤，〈我國行政區劃改革設想〉，氏著，《長水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37。

見。而潼關衛軍屯地跨豫、陝兩境，遇有河南境內潼軍生事的場合，相關問題更要出動豫、陝雙方大員方能解決。入清以後，由於衛所不再具有軍事功能，寄庄於各州縣的潼關軍丁反而成為各州縣優先考慮的歸併對象。及潼關廢衛改縣，其初猶為兵餉供應、屯糧徵收之便保持原潼關衛屯的完整性，然終究難抵屯地分散兩省十一州縣所帶來的困擾，逐步縮編成僅掌管潼關、華陰兩境內屯地的潼關廳，明初以來以「犬牙相制」為目的建立的機制一步步邁向土崩瓦解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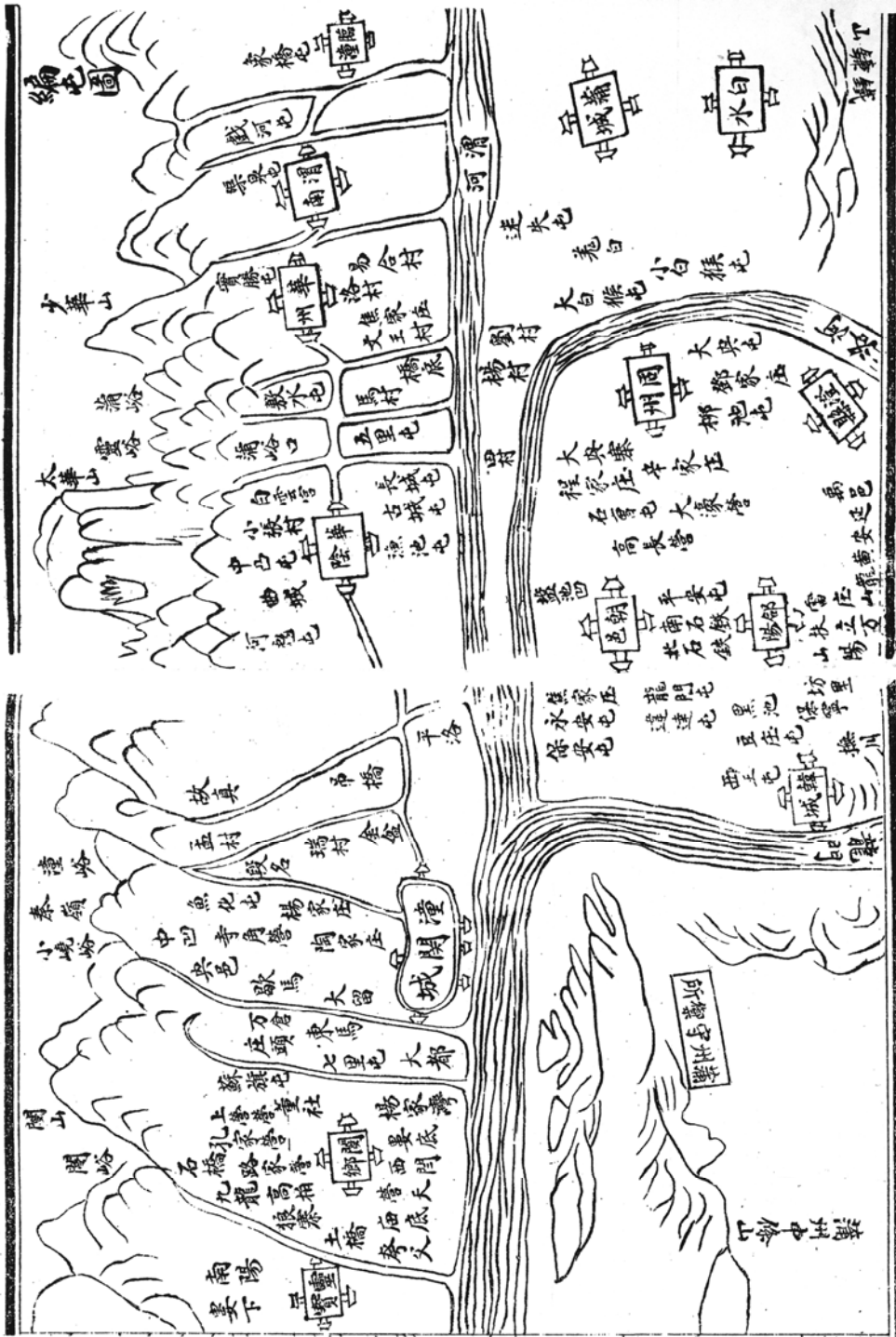
（本文於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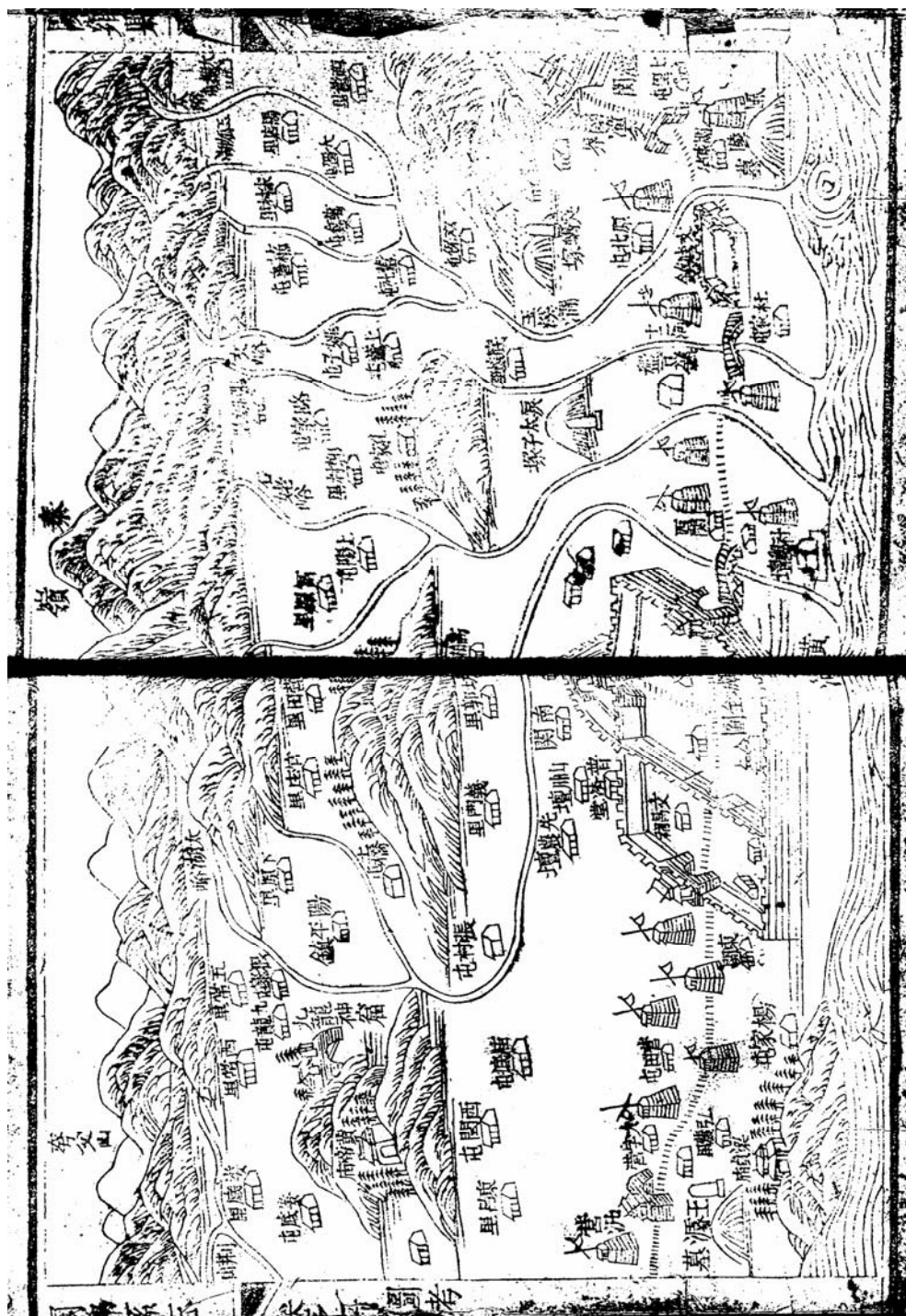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一般型研究計畫 NSC 94-2411-H-001-001-「明代華北地區衛所軍役研究 (3/3)」之成果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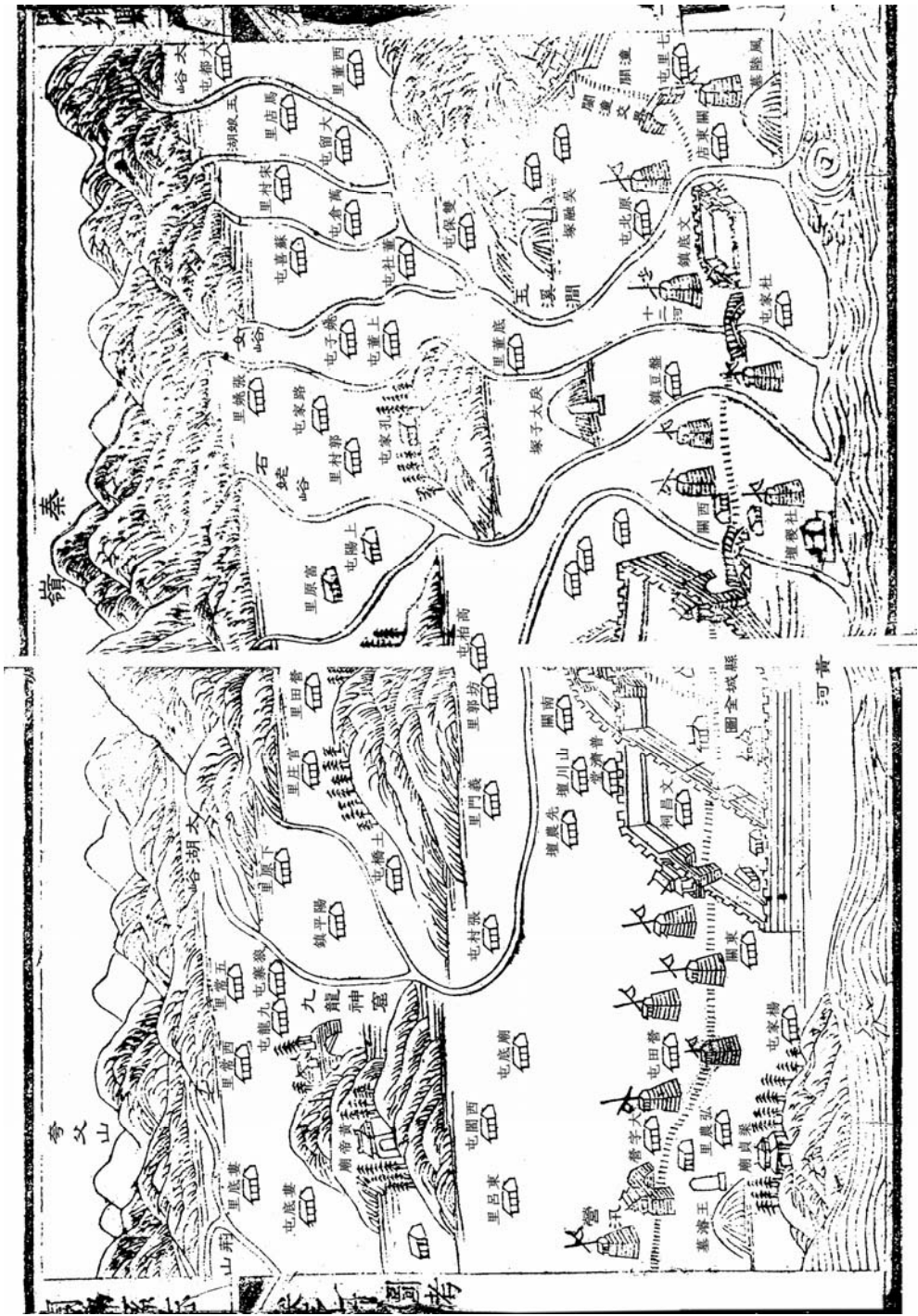
圖一：明代潼關衛位置圖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元·明時期〉，頁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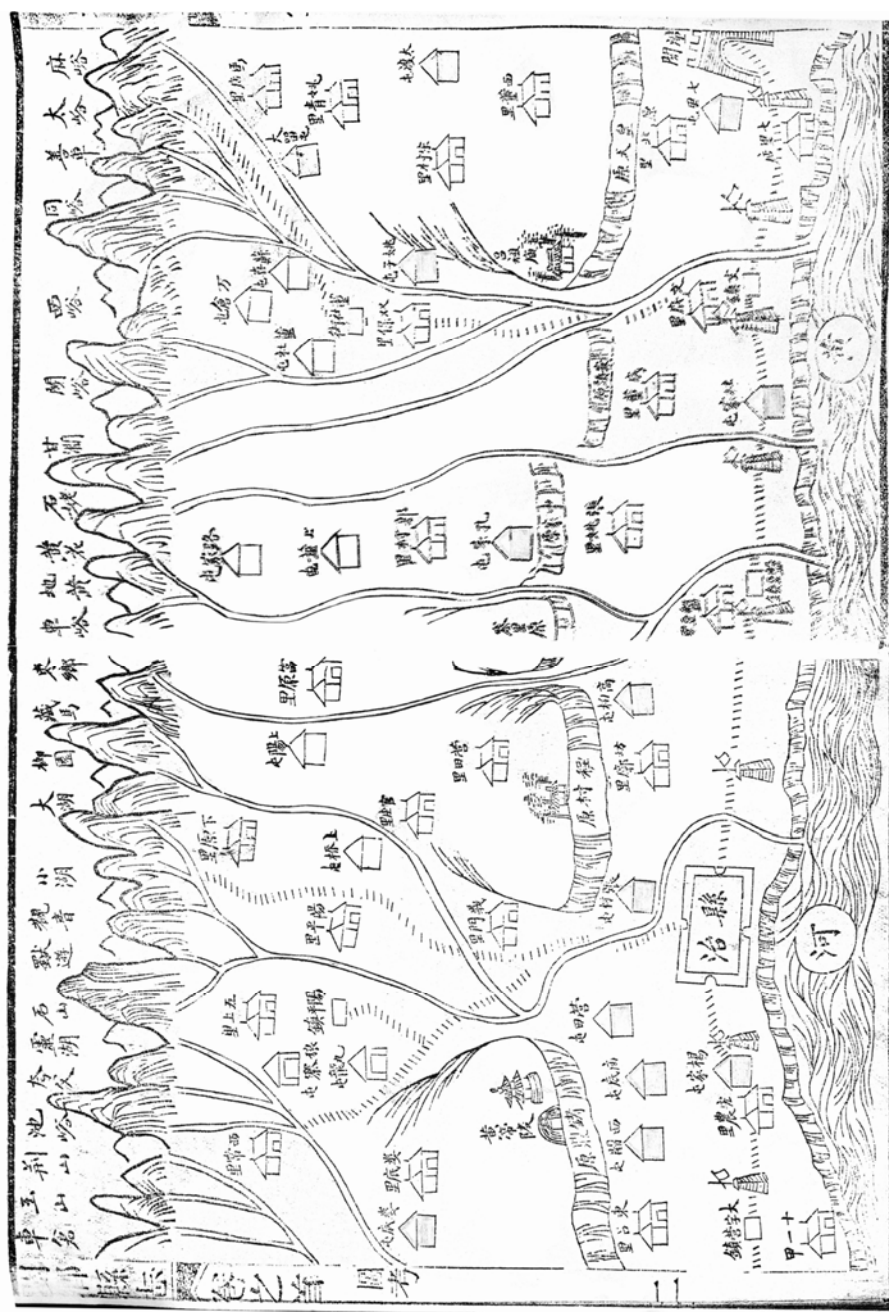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圖三之一：乾隆《閩鄉縣志》〈城池山川全圖（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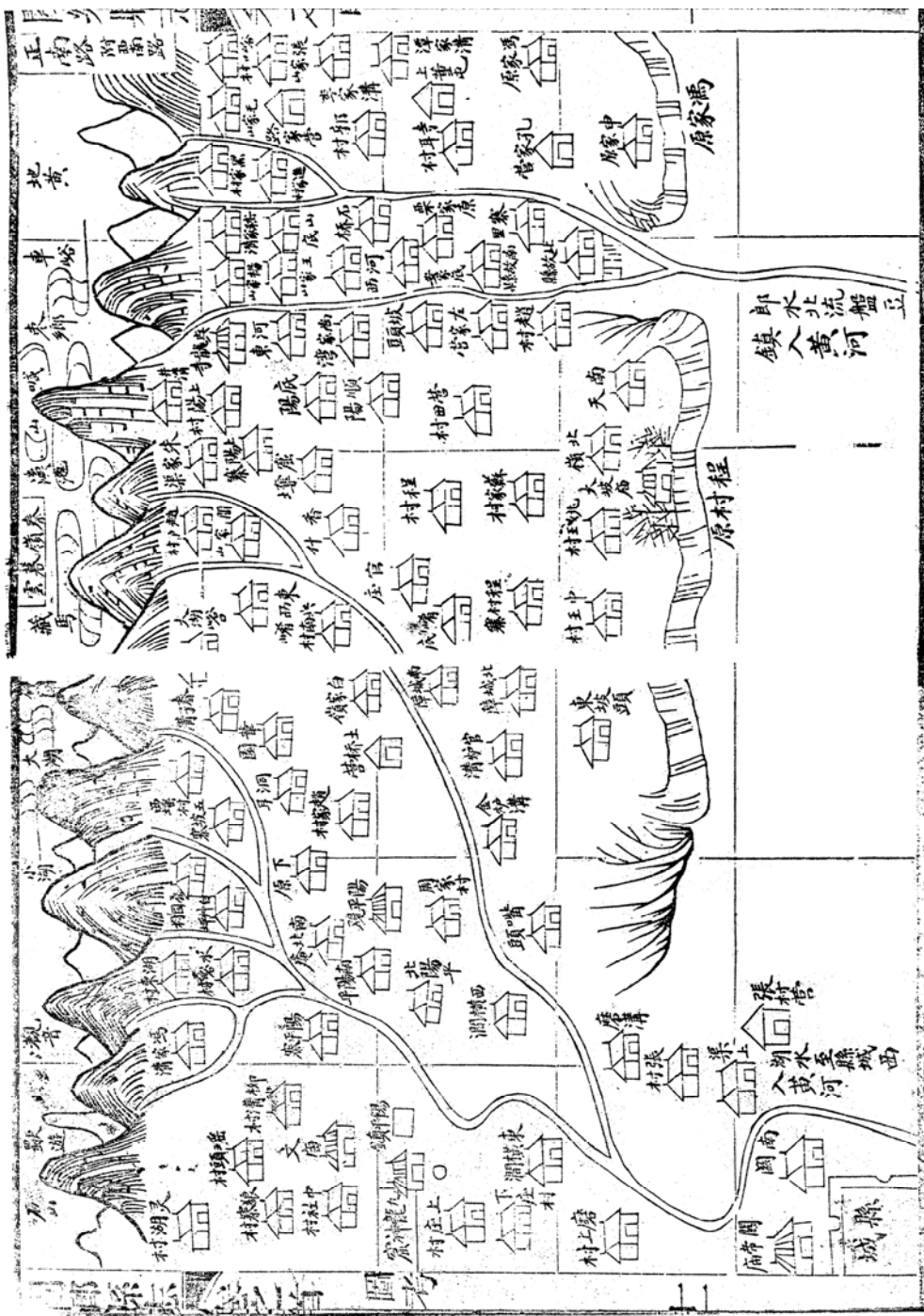


圖三之二：乾隆《關鄉縣志》〈城池山川全圖〉



按：光緒《閩鄉縣志·圖考說》卷首，頁12b，有云：「右圖按里開方，每方五里，由西及東。……其中，廟用正，村用斜，營屯用側，鎮用方，庶不混。」

圖四：光緒《閩鄉縣志》〈屯里圖〉



圖五：光緒《閩鄉縣志》〈村里分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或參網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ji?@7^1923298734^22^^1@@563270807>〔搜尋，2008.06.02〕）。
- 不著撰人，《兩河觀風便覽》殘存三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萬曆間刊本攝製。
- 不著撰人，陶承慶校正，《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十六卷，收入《明代史籍彙刊》第13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年焦璉刊本影印，1970。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王九疇修，張毓翰纂，萬曆《華陰縣志》八卷，補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清康熙五十二年重印明萬曆四十二年刊本攝製。
- 王祖嫡，《師竹堂集》三七卷，目錄二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天啓刻本影印，1997。
- 王崇、李應奎修，黃鈞等纂，嘉靖《歸德志》八卷，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60冊，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嘉靖刊本影印，1990。
- 向淮修，王森文纂，嘉慶《續潼關縣志》三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247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間重排印清嘉慶二十二年刊本影印，1970。
- 何耿繩重修，姚景衡纂，道光《重輯渭南縣志》十八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刊本。
- 吳炳道修，劉域纂，光緒《三續華州志》十二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八年序刊本。
- 吳泰來，乾隆《同州府志》六〇卷，首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六年刊本。
- 吳鋼主編，劉蘭芳、張江濤編著，《潼關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

- 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萬曆《大明會典》二二八卷，臺北：新文豐出版社據明萬曆間司禮監刊本影印，1976。
- 李東陽等纂，山根幸夫解題，正德《大明會典》一八〇卷，首一卷，東京：汲古書院據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刊本影印，1989。
- 李默、黃養蒙等刪定，《吏部職掌》不分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1996。
- 周慶增等纂修，劉坦等編，乾隆《閬鄉縣志》十二卷，首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刊本。
- 明太祖敕輯，楊一凡點校，《諸司職掌》，收入楊一凡、田濤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3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 邱濬著，林冠群、周濟夫校點，《大學衍義補》，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
- 胡汝礪編，管律重修，嘉靖《寧夏新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
- 茅元儀輯，《武備志》二四〇卷，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 孫傳庭，《白谷集》五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索爾訥等撰，《欽定學政全書》八〇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刻本影印，1997。
- 袁文新、柯仲炯等纂修，天啓《鳳書》八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69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天啓元年刊本影印，1985。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崑岡等奉敕著，《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一二二〇卷，北京：中華書局據清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1991。
- 張一英修，馬樸纂，天啓《同州志》十八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天啓五年刊本攝製。
- 張三省、楊遵修，杜允中等纂，順治《閬鄉縣志》六卷，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2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順治十一年刻，順治十六年、康熙五年增刻本影印，2007。
- 張廷玉等奉敕修，《明史》三三二卷，目錄四卷，臺北：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5。
- 張鹵，《皇明嘉隆疏抄》二二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72-73，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1996。

- 張學顏等撰，《萬曆會計錄》四三卷，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2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十年刻本縮印，1988。
- 符執桓纂修，康熙《新喻縣志》十四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889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影印，1989。
- 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五〇四卷，補遺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
- 陸維垣重修，李天秀纂，乾隆《華陰縣志》二二卷，首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十七年重鉛印清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 傅鳳翔輯，楊一凡、田禾點校，《皇明詔令》，收入劉海年、楊一凡總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3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 喬光烈，《最樂堂文集》六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影印，1997。
- 湯斌著，范志亭、范哲輯校，《湯斌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舒其紳等修，嚴長明纂，乾隆《西安府志》八〇卷，首一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31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影印，1970。
- 黃彰健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1966；或參網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現行版〕<http://140.109.138.249/ihpc/hanquery?@@1698200596>〔搜尋，2008.06.02〕）。
- 黃覺等修，韓嘉會等纂，民國《閬鄉縣志》二四卷，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119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影印，1968。
- 楊端本纂修，康熙《潼關衛志》，收入《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西北卷》第10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 楊端本纂修，康熙《潼關縣志》，收入《新修方志叢刊》第47，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清康熙廿四年刊民國廿年鉛字重印本影印，1967。
- 賈漢復修，沈荃編纂，順治《河南通志》五〇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刊本。
- 鄒守愚修，李濂纂，嘉靖《河南通志》四五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攝製。
- 趙希曾纂修，孔廣聰增修，光緒《陝州直隸州志》十五卷，首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七年刊本。

- 趙廷瑞纂修，嘉靖《陝西通志》四〇卷，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1-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影印，2005。
- 劉於義等奉敕修，沈青岷撰，雍正《陝西通志》一百卷，首一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1-55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清雍正十三年刊本影印，1983。
- 劉思恕纂修，王守恭等編纂，光緒《閩鄉縣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刊本。
- 蔣兆奎，《河東鹽法備覽》十二卷，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輯，第2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影印，1997。
- 譚吉璫纂修，康熙《延綏鎮志》六卷，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乾隆增補本影印，1996。
- 覺羅石麟總纂，《勅修河東鹽法志》十二卷，收入《中國史學叢書》第45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清雍正本影印，1966。
- 龔輝，《全陝政要》四卷，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2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嘉靖刻本影印，1988。

二・近人論著

于志嘉

- 1999 〈清代江西衛所的沿革與人口分佈〉，《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頁295-327。
- 2004 〈從《瑯辭》看明末直豫晉交界地區的衛所軍戶與軍民詞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5.4：745-795。
- 2005 〈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頁80-104。
- 2008 〈明北京行都督府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4：683-747。

王毓銓

- 1965 《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

朱保炯、謝沛霖編

- 1980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振鶴

- 1990a 〈犬牙相入還是山川形便？——行政區域劃界的原則〉，氏著，《體國經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國行政區劃沿革史》，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頁106-136。

- 1990b 〈從基本一致到部分背離——行政區劃與自然地理區劃的關係〉，氏著，《體國經野之道》，頁151-196。
- 周振鶴主編，郭紅、靳潤成著
2007 《中國行政區劃通史·明代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徐泓
1984 〈明北京行部考〉，《漢學研究》2.2：569-598。
- 梁建邦
1989 〈漫話潼關〉，《渭南師專學報（綜合版）》1989.1：103-107。
- 郭松義
1991 〈歸併舊明衛所實行“以屯濟運”〉，王毓銓、劉重日、郭松義、林永匡，《中國屯墾史》，北京：農業出版社，下冊，頁277-307。
- 郭紅
2001 《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04 〈明代都司衛所制度與軍管型政區〉，《軍事歷史研究》2004.4：78-87。
- 彭勇
2005 《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馮賢亮
2005 〈疆界錯壤：清代“蘇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江蘇社會科學》2005.4：211-217。
- 潘星輝
2005 〈現存明代《吏部職掌》版本考〉，氏著，《明代文官銓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272-275。
- 蔡嘉麟
2002 《明代的衛學教育》，宜蘭：明史研究小組。
- 顏廣文
1995 〈明代官吏任用迴避制度〉，關文發、顏廣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09-229。
- 譚其驤
1935 〈釋明代都司衛所制度〉，《禹貢半月刊》3.10：1-7。
- 2000 〈我國行政區劃改革設想〉，氏著，《長水粹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頁36-41。

譚其驤主編

- 1982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7冊，〈元・明時期〉，上海：地圖出版社。

顧誠

- 1984 《明末農民戰爭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 〈明前期耕地數新探〉，《中國社會科學》1986.4：193-213。
1988 〈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2：15-22。
1997 《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大澤顯浩

- 1993 〈『兩河觀風便覽』について〉，《汲古》23：100-106。

川越泰博

- 1977 〈明代班軍番上考〉，《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史學科》22：133-162。
1981 〈明代班軍番戍考〉(1)，《軍事史學》16.4：73-83。
1982 〈明代班軍番戍考〉(3)，《歷史における民衆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頁413-424。

宮崎洋一

- 1993 〈十八世紀中国の行政変革の特質—清朝乾隆期の山西省の事例を中心に—〉，《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1：29-46。

檜木野宣

- 1975 〈衛所制度の行方〉，氏著，《清代重要職官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頁365-378。

Interlocking Governmental Jurisdic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Case of the Tongguan Guard

Chih-chia Yu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principle of interlocking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to demarcat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empire has existed in imperial China since the Qin Dynasty. The purpose of this system was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centralized governmental power. After successive developments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the rulers of the Ming Dynasty used the principle of interlocking governance for the demarcation of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neighboring regional military commissions (*dusi*) and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s (*buzhengsi*) were closely interlocked.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lso some interspersed military districts which were under the direct jurisdiction of the Five Chief Military Commissio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e classic example of this is the Tongguan Guard which was located on the border between the Henan and Shaanxi Provinces, and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ninth year of the Hongwu Emperor.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ngguan Guar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the accompanying changes in power structures at the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al level.

At first, the Tongguan Guard wa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Henan *dusi*, but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Yongle Emperor, it was pu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Beijing Defense Branch Rear Chief Military Commission. After this office was abolished, it was pu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Rear Chief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finally under the direct jurisdiction of the Center Chief Military Commissio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ongguan Guard changed repeatedly a phenomenon which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se regions was too distant from Beijing, creating enormous difficulties related to their management. These garrisons were originally placed under the direct jurisdiction of the Five Chief Military Commissio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was done in an effort to assert central governmental power and curtail local power structures. However, as the ruling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ew weaker, the garrisons could no longer strengthen central governmental power but rather became dependant on local power bases for their normal operatio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ower structures of these garrisons can thus b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entralized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system of interlocking districts of jurisdiction which served to check and balance power was also clearly manifest 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Military Farms and civilian regions on the county and district level. The seventy-two military farms of the Ming Dynasty Tongguan Guard were dispersed between two districts and seven counties. In each of thes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terlocking power structures between military farms and civilian areas were manifest. Owing to the intermingling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s, and the superior strength of the army in relation to civilians, the misappropri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by the military became common-place. After the invasion of the Manchus, the Tongguan Guard was abolished and later replaced on the county level. The garrisons of the Tongguan Guard were initially retained intac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dispensing of soldiers' provisions, the stockpiling of grain, and the collection of taxes.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dispersal of the military farms into two provinces and eleven scattered districts or counties were difficult to resolve. Finally, the county-level Tongguan Guard was relegated to the sub-prefectural level and its area of jurisdiction dramatically reduce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early Ming Dynasty system of interlocking jurisdictional regions which had been intended to check and balance power gradually began to disintegrate.

Keywords: system of interlocking jurisdictional regions, Tongguan Guard, military division of districts, military service